

第36回 SGRA论坛in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 21世纪的课题

■ 论坛的宗旨

2000年7月设立以来，SGRA一直将“实现优秀地球市民”作为基本目标，对全球化以及市民社会加以关注，持续进行着研究活动。

“市民社会”这一词语的定义很多。不仅指18世纪欧洲市民革命后的“近代市民社会”，有时也指既不受国家权力也不受市场统制的“公共空间”。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则指以阶级对立为前提的有产阶级支配的社会。在经历过市民革命的现代市民社会，个人的自由得到保障、自发的活动组织形成社会是其成立的要件。冷战后，为了确保市民的自由，形成了一种思潮，那就是摆脱从前那种以共产党、工会为主体的单极型运动，而应该将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各团体结成网络展开多极型运动。从这一观点出发，有时也把由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以及它们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市民网络称为市民社会。

另一方面，近年，在东亚各国，随着经济的显著发展，促进市民社会形成的中产阶级诞生了。而且，各国受欧美文化、教育的影响都很大，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信息化以及人员交流的增进，各国知识人之间对市民社会的关心也高涨起来。但是，由于在东亚政治体制还存在差异，各国的社会基础、国民的思想基础也多种多样。因此，关于东亚的“市民社会”的讨论包含着非常复杂的问题，未必很十分活跃。

本论坛将东亚整个地区置于脑际，在思考市民社会是什么的基础上，请东亚各国的专家就各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以及现状进行报告，然后，由10国以上的日语很出色的年轻研究者们就东亚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今后所面临的课题进行自由讨论。

本论坛的目的并非在于解决问题和提出建议，而是在于进行启发和问题意识的共有化。

关于 SGRA

SGRA，以从世界各国来到日本、经过长期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研究生院取得博士学位的“知日派”外国研究者为中心，为了对个人或组织在树立面向全球化的方针与策略时有所裨益而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并将其成果以论坛、报告、网页等方式广泛地向社会传播信息。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多领域多国籍的研究者编成研究小组，广集智慧与人脉，从多方面的数据来分析、考察，进行研究。SGRA瞄准的不是某一特定的专家，而是广泛地以社会全体为对象，开展包含广阔研究领域的跨国界、跨学科的活动。SGRA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良好的地球市民作出贡献。详细情况请参看主页（www.aisf.or.jp/sgra/）。

欢迎阅览免费 SGRA 通信

每周三用电子邮件发送 SGRA 论坛的通知以及世界各地的 SGRA 会员的随笔。无论谁都可以免费阅览 SGRA 通信。希望阅览的朋友请在主页上登录。

<http://www.aisf.or.jp/sgra/>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 21 世纪的课题

总主持	林少阳（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准教授、SGRA 研究员）
日期	2009 年 7 月 25 日（星期六）14：00-18：00 / 19：30-21：00
会场	鹿岛建设轻井泽研修中心会议室
主办	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协办	（财）鹿岛学术振兴财团、（财）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

14：00-14：10 开会致辞 今西淳子（SGRA 代表）

14：10-14：50 基调演讲

寻求市民社会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足迹与亚洲

7

宫岛乔（法政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

在摆脱了殖民统治、迈向独立国家建设的战后亚洲，民族主义曾经有着至上的价值，而战后欧洲则是从认识到自身的罪恶而起步的。纳粹凶残的人种迫害也是其一。建设没有国境的欧洲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向多国间对话、多民族共生、人权问题的共有、缩小贫富分化等课题进行了挑战。而且，国家主权的相对化得到推进，欧洲市民权获得认可，国际司法、区域、NGO 等扮演重要角色的新的市民社会正在逐步构建。但是，也存在着非欧洲移民的社会统合等未尽的课题。若要在东亚谋求共同体的形成，有必要付出真心诚意和不懈的努力来解决上述所有课题。在此探讨欧洲这半个世纪的足迹会给亚洲以及日本怎样的启示与教训。

14 : 50-15 : 10 【报告1】

日本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从“市民社会”到“市民政治”

14

都筑勉（信州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市民社会”这一用语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强的昭和初期的论坛上与“资本主义社会”是同义的。这也证明在当时的日本多少存在着作为阶级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这一词语再次受到关注是在战后1950年代后半期。这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前夜，是大众社会论与中间文化论出现的时期。通过60年安保，无党派的“市民”的行动抬头，60年代，像“越平连”一样的市民运动扎根下来。在东欧自由化、民主化时代之后，世界舆论提起新的市民社会论之前，日本已经存在着这样的思想积蓄。同样是90年代，在志愿者活动和NPO发展起来时，人们赋予其市民活动这一称呼。在新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活动以及以往的市民运动当中，有着连续与非连续的部分。在以上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今后能开展怎样的市民政治是日本的课题。

15 : 10-15 : 30 【报告2】

韩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从“民众”到“市民”

——殖民地、隔阂与战争、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民主化

20

高熙卓（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SGRA研究员）

在韩国社会里，“市民”或者“市民社会”这个用语还并不深入人心。最早开始意识到这一概念至多是在进入2000年代以后。在政治性参加、抵抗目前秩序的自律性主体的意义上，以往使用的是“民众”。那时，“市民”与资产阶级被视为同类，其中有着很强的否定性色彩。在从“民众”到“市民”的推移的过程中，横亘着韩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的轨迹。我想沿着殖民地、隔阂与战争、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民主化的过程，就各自的历史性意义以及留下的课题来进行思考。

15 : 30-15 : 50 问答 26

15 : 50-16 : 20 休息

16 : 20-16 : 40 【报告3】

菲律宾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菲律宾的“市民社会”与“不良撒马利亚人”

29

中西彻（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本报告的目的是通过充分利用市井的人们既有的共同体资源来讨论菲律宾

实现真正的社会发展的条件。人们屡屡论及要实现菲律宾的社会发展，有必要通过自由化来排除既得权益、实现“良好政治”，谋求其具有典型意义的固定阶层社会的流动化。另一方面，Ha-Joong Chang（张夏准，2007）批判以往开发经济学的主流“新自由主义”，就发达国家与国际机构在进行开发援助时所重视的自由化和“良好政治”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批判性再探讨。本报告将以这些讨论为前提，就基于菲律宾所存在的“民众知”（Scott：1998）这一体系的存在、意义以及可能性进行考察。

16：40-17：00 【报告4】

台湾、香港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被“国家”所愚弄的“边境东亚”的“市民” ——脱殖民地化、脱“边境”化的纠葛与自我认同的探索

36

林泉忠（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琉球大学准教授、SGRA研究员）

被置于殖民地支配体制下的地区果真存在形成市民社会的可能吗？如果有可能的话，哪些条件是必要的呢？台湾与香港共同拥有着近代以后受异民族支配的体验，而且战后也有着“祖国复归”这一独特的体验。更进一步，两个地区在返还之后也分别被置于特别的“国家”体系之中。本报告将叙述被“国家”所愚弄的台湾和香港的人们分别在殖民地时代如何追求“平等”开始开展市民运动的。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后“祖国复归”时代，被置于特殊的“国家”体系与政治体制中，两者又是如何在直面摆脱殖民地化的困难的同时来追求脱“边境”化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的。进而讨论这些纠葛与反殖民地主义、民主化问题的关联，以及市民运动所扮演的角色。

17：00-17：20 【报告5】

越南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变化的越南、变化的“市民社会”的姿态

43

Vu Thi Minh Chi（越南社会科学院人间科学研究所研究员、SGRA会员）

越南在1986年开始的“刷新政策”下，除了经济体制之外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形成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要素诞生了。其间，近年，关于市民社会是否在慢慢形成的讨论开始在学界涌现。以这样的状况为背景，本报告将就越南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现状、以及将来的课题进行叙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 1 越南的“市民社会”概念的特质
- 2 从市民社会指标（CSI:Structure;Environment;Values;Impact）来看市民社会的可能性与局限
- 3 21世纪的课题：市民社会的姿态的变化

17:20-17:40 【报告6】

中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摸索中的“中国式市民社会”

49

刘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建国以来60年，转向改革开放以来30年，在中国除了“人民”这一耳熟能详的概念之外，“公民”这一表达方式也开始频繁地使用起来了。培养怎样的“公民意识”将左右目标建立法制国家的中国的前进道路。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的形成使“政府”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增幅，对于国家的安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构筑以知识人为中心的跨越国境的知的公共空间的尝试也在进行，社会的多元化以及价值观的多样化得到了促进。“中国的市民社会”虽然包含着各种问题，但是将如何展开？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将如何变化？我将在介绍近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考察。

19:30-21:00

公开座谈讨论会

55

主 持：孙军悦（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非常勤讲师、SGRA研究员）

讨论者：以上的讲演者

21:00

闭会致辞 嶋津忠广（SGRA运营委员长）

报告人简历 70

后记 林少阳/Kaba Melek 72



寻求市民社会的 半个世纪

——欧洲的足迹与亚洲

宫岛乔（法政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

今天的论坛是选取“市民社会”这一词语来讨论特别是在亚洲有着怎样的意义，但是，我的专业不是亚洲，而是欧洲研究。只是出于对人群移动的关注，最近开始踏足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在这些地方也开始听到“市民社会”这一词语，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关注。今天我想用三分之二的时间来讲一讲欧洲的市民社会的最近的走向，对于亚洲虽然还不充分，也作一下评论。

欧洲评议会与人权条约

应该如何来看待市民社会呢？作为古典的概念，比如说在黑格尔哲学中，以“市民社会”或者“欲望的体系”的形式而出现。这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包含“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否定的意思，也在稍稍不同的文脉中为马克思所继承。然而，今天，我想在与以国家、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管理体制的对比中，用于指一个社会管理体制的状态，将之称为“市民社会”。重视多数“市民”的意志与利益，作为其代表的政府也作为一个要素，与地方自治体、政党、市民团体（NGO）等之间所形成的“共治”（共同统治）系统。

我们先来看战后欧洲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起步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战后欧洲经历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猛烈威力与世界大战，是在自觉到“国家民族主义之恶”的同时起步的。亚洲在从殖民地独立的过程中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而与之相对的是欧洲的出发不是这样的。纳粹主义是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

欧洲是在“不再发起战争”的非战宣言，或者说是“以建立永久和平的国家为目标”的意志下出发的。而且，为了在国家与国家相对立交战的过去上画上休止符，作为一个果敢的构想，打出了“没有国境的欧洲”的口号。其象征性事件就是，在1950年的欧洲评议会上通过了欧洲人权条约。这里有着“人权应该成为

联盟的基本”的想法，人权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当时是对纳粹主义的回忆还是活生生的，而且市民们来不及躲避战后扩大的共产圈而向西亡命的时期。将人权作为统合的基本之一是颇有理由的。

欧洲评议会（Council of Europe）是1949年8月由10个国家创立的，远远早于EU的成立。在此之前，1946年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的演说中高扬“欧洲必须成为一个”，这一演说给人们以感动，在争取成为“欧洲合众国”各国的政府与议会这一目标意识之下，欧洲评议会出发了，将和平、正义、人权的实现作为应该共有的目的。然而，在涉及到该机关向何种方向发展的问题时，英国等对于分别移让国家的主权成立欧洲联邦的方向表示反对，因此欧洲评议会并没有向着那一方向前进。后来，想要具体推进欧洲的经济统合与政治统合的法国、德国等6国向结成EU迈进，但是这些国家也继续作为欧洲评议会成员的事实并未改变。因而，作为与EU不同的机关发挥作用，主要在人权的实现和保障方面活动，EC站在了EU的补充的位置上。其关系是，关于人权由欧洲评议会保障，EU则全面地接受了这一点。

关于“欧洲人权条约”，其批准国超过了50个。可以说是囊括了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该条约有着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具体条约的特征，基本的人权与自由的保障、特别是家庭生活的保障包含于其中，这样就有着重重要的意义。正如法国的法学者Frédéric Sudre所说“与别的条约不同，这是干涉内政的条约”那样，“并非内政不干涉”是很大的特征。设立了以这一条约为法源的司法机关欧洲人权裁判所，比如说，有缔约国涉嫌作出了违反欧洲人权条约的处分，其当事者进行起诉，该法院作出承认的决定时，该国就必须据此取消处分，根据必要进行法律修正。在这个意义上，借Frédéric Sudre的话就是“欧洲人权条约是干涉内政的条约”，是有着如此强力的条约。而且，“缔约国的居住者不分国籍可以进行起诉”也是重大的特征。比如说滞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的移民劳动者可以向欧洲人权裁判所提起诉讼，说在德国国内受到如此这般不当的处置，根据欧洲人权条约是不当的。当事者是外国人这一点不构成拒绝的理由。

我的专业是移民，也就是人的国际性移动，所以从这样的关心来注目，而此前有各种各样的诉讼。因为滞留非正规而接到驱逐国外命令的外国人，强调“和家族在一起生活”这一点，说滞留是为欧洲人权条约所保护的权利，而欧洲人权裁判所认定了这一点向政府要求停止执行驱逐国外的命令，滞留就被承认了。我想强调的是，人权在欧洲有着重要的意义，人权为法律所证明，并伴随着制裁。

EU的多边主义

接下来谈一谈EC。

1957年的罗马条约标志着EC的创立，在EC多边主义的观点极其重要。在Messina和布鲁塞尔进行面向条约制定的最后的外务大臣交涉时，小国比利时的外务大臣Spark十分活跃，这一点至今仍为大家津津乐道。这就是“欧洲各国已经不能单独带来经济繁荣和安全保障，与他国的政策协调不可或缺”的认识是共通的。因此，小国方面提出要求，警戒以强大国家为中心决定事务，不以多数决定为宜，寻求全会一致。我想可以说对强国的霸权主义的警戒是一特征。

事实上，EU中，多国间进行着顽强的交涉。比如说，有时国民投票的结果，某国对于某重要的条约不进行批准。现在，因为爱尔兰通过国民投票表达反对里斯本条约的意思，所以该条约仍悬而未决。因人口仅400万的国家不同意而使条约悬而未决也可以看作没有效率，但是，即便是400万的人口，既然一个国家或者国民表示出不同意的意思的话就不能强行实施，这就是欧洲式的思维方式。

环顾国际社会，实践多边主义的地方并不多。众所周知，被冠以“帝国”的美国大多讨厌多边主义，作为大国而喜好以两国间主义进行交涉。在欧洲则很难被容许，这一点政治领导人在采取行动时，头脑中必须一直绷紧这根弦。

欧洲委员会与咨询机关

接下来看一下非政府团体（NGO）的参与结构。在欧洲使用“政府”这个词语时，欧洲委员会是不是政府，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欧洲委员会官方场合相当于内阁。现在，决议、立法机关是内阁理事会，但是欧洲议会也分有之。我想欧洲议会的权限将会更加强化。加之，我认为各种咨询机关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很有灵活性。

关于后者，各国的地方自治体代表聚集在地域委员会这一非常大的咨询机关，在EU中被给予很大的发言的机会。此外，据说还有经济社会审议会等超过1,000个的咨询机关，几乎无法数清。因为专业上的原因我所知道的是，欧洲委员会的咨询机关里有“移民论坛”，据说这是将EU以外的第三国出身的移民团体组织成几十个而成的，对欧洲委员会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也有“奥德赛网”这一学者与专家的论坛，具体地向欧洲委员会陈述各种意见。以这种形式，包括很多民间团体在内的多样的机关，在“合作伙伴”的想法之下，置于欧洲委员会之下。

欧洲议会所代表的东西

刚才已经讲过，现在的欧洲议会不是EU专门的表决、立法机关，而是与内阁理事会分有之。由各国公选而诞生的欧洲议会的议员全部有785人，任期为5年。就在最近也进行了选举。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在“欧元高级技术官僚”，即在欧洲委员会下工作的官僚们作出由上而下的决定时，欧洲议会的不可或缺的机能是，对之进行检定，有时候作出否定。然后，保护各国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各国中的少数语言或者少数民族的各种各样的决议也是在欧洲议会中作出的。常说“文化的多样性与对其的尊重”是欧洲的精神，是应该实践的口号，我想在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就是欧洲议会吗。当然，地域委员会等咨询机关也扮演着共同的角色。

还有，文化的多样性，也给EU带来了棘手且高成本的问题。建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与莱茵河相连的水路边的欧洲议会大厅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全部用玻璃装饰。EU的建筑都是现代的，往坏处说是没有个性的建筑物，不为当地居民所喜欢。斯特拉斯堡是德国式的、人字墙相连的美丽的阿尔萨斯地区，但是那里有一角破坏

了该建筑式样的谐调。询问一下建造这样的建筑的理由，回答让我觉得“原来如此”。在欧洲如果建设诸如看似法国式、德国式、或者奥地利式的有传统的特定样式的建筑的话，必然引起他国的批判。因为会产生偏向与特定国家或地域相关联的文化的结果，所以不被认同。可以说是有着多样的历史传统相竞争的欧洲所特有的烦恼。

而且，从尊重语言的多样性这一原则出发，在欧洲议会加盟国的国家语言都是公用语言，必须有庞大数量的同声传译来支持会议。虽然为此的人工费、器械费的成本达到很大的数额，但是没有意见认为要将公用语言定为英语+○○语。这其中也许可以看到在尊重文化的同时，也重视刚才所讲到的多边主义的表现。

向缩小贫富差距挑战——EU市民社会的课题

在EU谈论市民社会的建设时，感到还是贫富差距是个大问题。

首先，在区域内经济的差距很大，但是在曾经的EU15国的时代，葡萄牙、希腊与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德国、法国的差距缩小了很多，在GDP上改善到3比1左右。然而，因为2004年、2005年EU的扩大，人均GDP为德国、法国的八分之一等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加入进来，人们认识到解决经济差距的课题越来越大。抱着这两个艰巨的课题，而强烈意识到这些课题的现实更加重要。

解决地域贫富差距的计划，由成立于1975年的“欧洲地域开发基金”来推进。基本的认识是如果收入差距为1比5，那么就不能采取共通的政策。为此，认为有必要进行区域内的收入再分配，就建立了基金来分配这些资金。EC认为按国家分配的想法不充分，有必要正确地把握不同地域的指标，按地域有重点地进行分配。

比如，即便在发达国家德国中，从经济指标上来看，旧东德有必要进行援助，于是这里成为援助的对象。或者，发达国家法国南部的科西嘉岛，比利时的工业地带中业已衰退的瓦隆也成为对象。还有，以补助开发预算的二分之一的形式，地域上设立开发项目成为援助的条件。我想今后在亚洲或者东亚将会讨论到共同体的形成，但是正因为是有着巨大经济差距的亚洲，一定需要作出缩小的努力，有必要了解这种欧洲式模式。

民族共生的考验

很多的外国人劳动者为支持经济的发展而来，欧洲的统一与这一多民族化的过程并行推进。这提出了一个与外国人、移民共生的课题，今天更成为一个巨大的课题。外国人口如图所示，德国是600万人，法国是在300～400万之间推移，最近西班牙、意大利急速增加。日本也列在其中，但是从人口比上来看比欧洲的主要国家少很多。

在EU地域内住着的外国人总数大概不下2000万人。

这里也包含了作为“难民”接收的外国人，重视人权的欧洲各国尤其多，总共每年接收30～40万人左右的庇护申请者。这与日本相比是何等巨大的数值啊。

不断增加的外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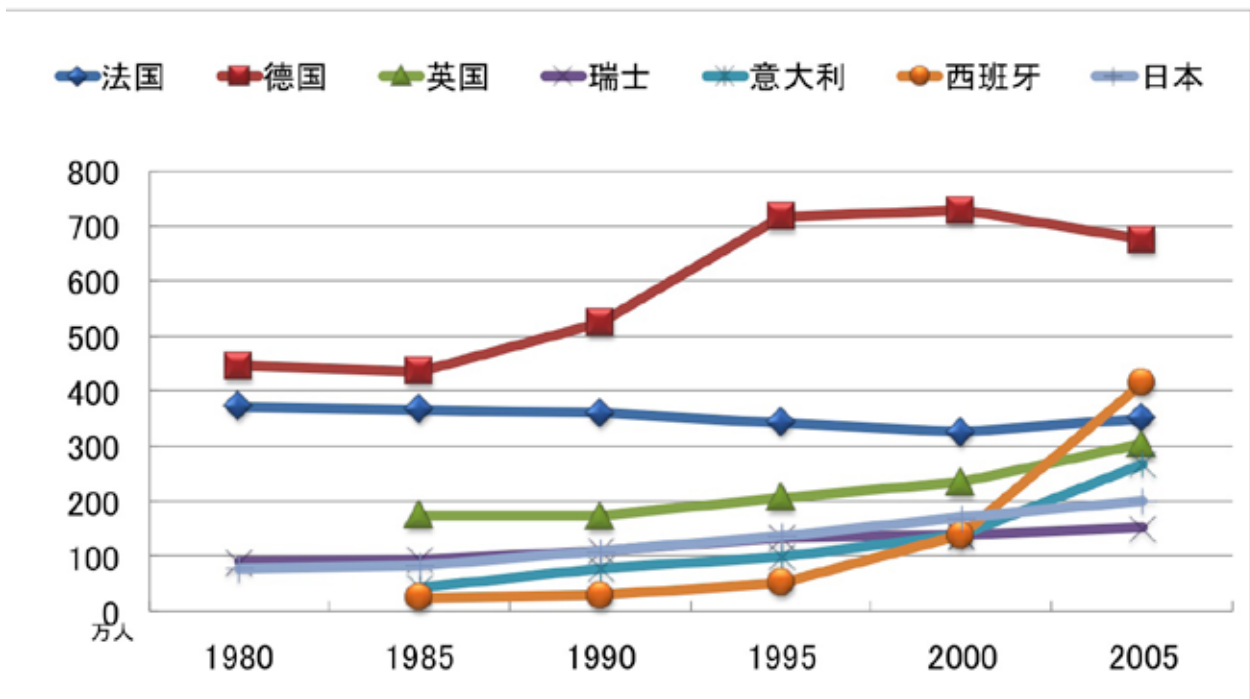


图1 欧洲主要国家与日本的外国人人人口

在前些天的报纸上看到日本外务省对于难民申请者此前支付的保护费由于超过了预算而被削减。而且非常吝啬地说是削减100人左右的份额。日本说申请庇护的人最近每年超过1000人，然而这还是很少。外务省作为保护费给每个人每月不满10万日元的补助，而这也不得不削减。从法国、德国来看，日本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即便小国荷兰、瑞士等为接收难民所用的预算也是日本的几十倍，想到这一点让人愕然。

然而并不容易的共生

但是，现实中在EU主要国家，对于非欧洲移民的歧视、排斥事件连续不断。2005年秋，在巴黎郊外，被认为是移民的年轻人们发起了抗议歧视的“暴动”，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对于从非洲、印度次大陆来的移民，也有政治势力以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为由而呼吁警戒，或者展开反伊斯兰的运动，这成了问题。我认为与之相关，非欧洲移民、土耳其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们有着高达20-25%的失业率。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此，EU与欧洲评议会将人种歧视看成是深刻的大问题，展开了扑灭运动。在

1999 年生效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承认了 EU 对以民族和宗教等理由的歧视进行处置的权限，所以我认为今后 EU 会更加加强反歧视的行动，但是将来并不容乐观。我在共同研究中现在致力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欧洲是否可能实现移民的社会性综合。



图2 巴黎郊外的“暴动”中被烧毁的公交车

EU 市民权给亚洲的启示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EU 市民权，对于亚洲而言它是否可以实现。首先，必须建成“市民的欧洲”是基本。为此，有果敢的提案称对于 EU 各国民设定共通市民权，并且开始运作起来。其内容规定了，承认跨越国境的自由的移动、自由的居住，在居住的他国可以参加地方议员、欧洲议会议员的选举。这纳入了 1993 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我认为这是在欧洲建立开放且有连带感的市民社会的尝试，值得关注。但是，因为在 EU 加盟国间的相互主义的限制下，第三国国籍的居住者遭到排斥，这一点将会被要求改善吧。

然而，这样的情况果真在东亚将来可能实现吗？这是最后的要点。在东亚，首先有必要对历史进行反省，毋庸赘言，这首先是日本应该解决的课题，这将成为根本的出发点吧。然后，我认为有必要实现面向开放的民族主义的多边主义对话、理解、调整。日本即便在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上取得主导权，也必须站在多边主义的立场上。看一下欧洲就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进一步，也有必要保障自治体、NGO、市民参加多国间交流。现在，虽然说“东亚共同体”，但是还停留在政府间、首脑间的各种国家层面上，光这样的话根本不充分。

进一步说到基本的东西，在亚洲，没有相当于欧洲人权条约的东西。虽然亚洲各国也开始加盟了难民条约、国际人权规约等条约，但是我觉得是否也需要基于亚洲各国人民认真讨论和同意的人权条约呢。

像欧洲那样承认跨越国境的自由的移动、自由的居住，在现实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经济差距的亚洲中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认为必须实现更加公正的移动与滞留。特别是日本从南亚用超低薪水引进研修生，或者似乎进行人员买卖的女性们的移动。有必要改正这些状况。

还有，关于跨越国籍、国境的市民权，虽然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完整，但是承认家族一起生活的权利，即合法滞留的外国人叫上自己的家人。或者虽然在韩国已经实现了，即承认外国人的地方参政权。这些事例是否可以多积累一些呢。

若将共同体当作人们有信赖的持续性联接的话，光是经济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合作协议是不充分的。必须成立某种组织来平衡地域的贫富差距。虽然可能达不到欧洲那样，但是我想应该探讨像EU的地域开发基金和构造基金的形式是否可能。

在亚洲，一方面有少子老龄化的国家，另一方面有人口依然持续增长的国家。我想在这种人口的不均衡之下人的输出与流入会持续下去，但是必须由此迈向实质性的多文化共生。多文化共生是个暧昧的词语，但是必须以承认流动人群的定居化、承认与家人一起生活、或是尊重他们的文化的形式来推进接纳。日本在这点上做得也很不充分，但是看一下台湾、新加坡的例子，也在进行着不能称之为多文化共生的外国人劳动者的接纳。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我只想强调通过市民间协作的人权监督的重要性。我在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进行听取调查，深深感到必须首先开始这项工作。

谢谢大家。

报告 1



日本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从“市民社会”到
“市民政治”

都筑勉（信州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我认为，与“市民社会”相比，“市民政治”还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或许与今天的主题也有一点距离。在“东亚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这一共同论题中，大概不仅要叙述各国的情况，还带有由此来探求东亚地域连带的可能性的意图。与之相对，我担心所讲的内容只能停留在日本人当中常见的吐露内向型关心的水平上。但是，如果能够讲得精彩的话，我相信通过探求一国的国民統合的刷新方式，可以扩大与抱有共同问题的各国人们之间的交流。

三层建筑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这一日语，其意思呈现出所谓的三层建筑的样子。正好是20世纪的30年代、60年代、90年代这三个时代所形成的。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举个例子，在战前1932年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里收录了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平野义太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史》，文中将市民社会的意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对，有人指出从1950年代后半起，以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新中间层的扩大为背景，出现了新的市民阶层。1957年社会学者加藤秀俊所撰写的《中间文化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同一时期，政治学者松下圭一也宣告大众社会的诞生，但是他认为其担当者表象为“市民”是1966年以后的事情。当时，加藤秀俊认为日本的社会与文化的构造从葫芦型变成了灯笼型，而现在的日本所呈现的状况可能正好与之相反。

市民这一象征是在1958年反对修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的运动中，通过提出“市民们，站起来！”这一口号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同时提出的还有“妨碍约会的警职法”这一标语。从保护市民的私生活的观点来看，这是表达一种抵抗国家权力随心所欲的姿态。而且，在反对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强行表决的1960年的运动中，市民这一象征得到了广泛的渗透。通过1965年抗议美国轰炸北越南的“还越南以和平！市民联合”（通称“越平联”）的运动，市民运动这一词语固定下来。

给市民社会这一日语添加上新意义的是借助1989年以东欧诸国的自由化、民主化为契机的新的市民社会论的抬头。此时，不仅是反权力，也包含了对资本霸道行为的警惕心理。但是，如果能回顾到市民社会原本是靠市场经济的成立所带来的经济人的诞生而支撑起来的话，我认为将反市场经济进行到底是致力于向道德主义寻求新的市民社会的基础。

为了识别以上“市民社会”这一日语的三层意义构造的各个层次，这里模仿政治学者高畠通敏，将第1与第2意义层面的市民社会分别称为“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与“大众型市民社会”，而姑且用我的用语将第3侧面称为“结社型市民社会”。

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

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呢？1972年出版了丸谷才一的小说《独自一人的叛乱》。对于因拒绝去防卫厅而从通产省调到家电公司的主人公，朋友问“在现在的日本，说到市民，到底是指什么？”，小说就是从这句问话开始的。主人公是明治自由民权运动地方名望家的后代，认为对于作为市民社会的大前提的自由，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也要保护自我，而对他人则尽量保护。小说的题目大概是从这里来的吧。

但是，他的日常生活是由常年在他家工作的很有能耐的“女佣人”支撑的。有一天，她声称说“要离家出走”。这时主人公注意到市民社会不就是受奴隶之恩惠而存在的吗。这部小说写于1972年。在那个时代，这部小说还有着现实性。更重要的事，我认为作家在那个时代重新描绘了自由的市民社会的本质。

如此说来，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不断有杰作问世的夏目漱石的作品中，从第一部作品《我是猫》到遗作《明暗》，都有被称为“下女（女佣人）”的女性登场。无论是最初揪住猫头扔出去的，还是培养哥儿的都是“下女”。《明暗》中的年轻夫妇能够每天高谈阔论也只是因为有“下女”料理身边的一切。

野上弥生子的大作《迷路》很鲜明地描绘了战前日本的市民社会的样子。比如，当时在轻井泽这里拥有别墅的人们们的世界。今天，在轻井泽银座吃着冰激凌的是大众型市民社会的年轻人。与之相对，若向森林深处迈进一步的话，那里还残存着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的遗迹。《迷路》所传达的是，在战前日本形成了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的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热爱、期待与英美的友好关系、憎恶野蛮的军国主义以及与德意的军事联盟的事实，还有他们从根本上缺失阻止日本战争的能力的事实。

即便到了战后，除去刚战败时的混乱，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的生活样式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我最近看了小津安二郎1952年的电影《茶泡饭的味道》，十分吃惊。主人公夫妇所住的家并不太大，可以说是典型的小资吧。妻子经常去看戏，或是出去吃饭玩耍。丈夫是这个时代到海外出差的精英白领，但是有着出身于地方的朴素，很喜欢茶泡饭。妻子有点看不上这样的丈夫。虽然有些失和，但是言归于好后夫妇决定一起来吃茶泡饭。可是，妻子不知道米饭与咸菜放在哪里。因为她没进过厨房。当然原因是家里有“女中（女佣人）”。

1952年是我出生的年份，而同年制作的黑泽明的名作《活着》却有所不同。这是一部很有名的电影，我想知道的人也很多，其主人公是市政府的市民课长。之前无所作为的他在得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为了将雨水淤积的洼地改造成公园而奔走。市政府里有土木课、公园课、卫生课等，是竖向式的组织。市民课只是受理市民不满的窗口。背着孩子的老人们来到窗口说“洼地不卫生，能不能想办法”。因为这是市政府，所以该不该找市民课有些微妙。或许应该找町公所，或许是町民课。但是，无论如何市民这一词语在政府机关的课的名字里出现了。稍过一些时候，就进入了大众型市民社会。

大众型市民社会

关于大众型市民社会，由于时间关系，我想一开始谈的部分就足够了。但是补充一点，就是描写大众型市民社会刚开始形成的1950年代后半期的两部作品。即描绘1950年代（昭和30年代）的人情与风景的山崎贵的2005年的电影《ALWAYS 三丁目的夕阳》，以及改编成电视剧、最近很受好评的城山三郎1975年创作的小说《官僚们的夏天》。我想恐怕激发起了在那个时代开始识物记事而现在快到60多岁的“团块世代”的人们的乡愁。

关于“团块世代”，最近出版了上下2册超过两千页的大部头著作《1968》的小熊英二曾经有过这样一段饶有兴味的谈话。战后不久他们出生了，日本当时是发展中国家的状态。在农村还穿着和服、剃着光头或毛盖头（河童头）的孩子们，成长起来20年后是牛仔裤加长发的形象。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成长起来的团块世代，在因经济发展而激变为发达国家的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巨大落差与摩擦的现象”是1960年后半期的大学纷争，即年轻人反叛的原因。

回溯一下的话，无论是在日俄战争翌年1906年为升入高中从姬路来到东京的哲学家和辻哲郎，还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同年从兵库县来到东京的三木清，都惊异于东京这一大都市的光景（参照前者的《自叙传的尝试》1961年；后者的《读书与人生》1942年。和辻与描写了为上大学而从熊本来到东京的主人公的夏目漱石的小说《三四郎》（1909年）的时代背景相重合）。

但是，从战后1950年代后半到60年代所发生的，不仅是东京的显著的变化，还有从地方来到东京的年轻人的大量增加。而且当时电视、周刊杂志等新媒体的登场也为全国人的生活样式的均一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样大众型市民社会成立了。

结社型市民社会

从1989年算起，正好过去了20年。当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最鼎盛的时期，遭遇了昭和天皇的驾崩与RECRUIT事件，天安门事件、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这些事件的关联性对于日本意味着什么，当然没有马上知晓。中国研究者中岛岭雄在天安门事件眼看就要被镇压之前，将之与60年的安保进行比较，认为中国也迎来了市民社会成熟的阶段。

稍后，苏联研究者下斗米伸夫表示，看到91年苏联的8月革命，在苏联首次发生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纷争，市民战胜了国家。我觉得这说到了事件的本质，但是总有着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然而，事态马上反弹到日本。

首先是1990年的海湾危机。RECRUIT事件使自民党的所有的首相候选人都落选，其结果当上首相的是竹下派针对舆论所推举出的海部俊树。在这个弱首相的手下，日本被迫重新考虑在此之前的和平主义。此前的和平主义是指对于国际纷争无所作为。作为发动了过去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国家，不自主地参与国际纷争，有其特有的意义。所谓的谨慎态度。但是，因为冷战的结束，安全保障的范式变化了。无论是对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的美国，还是对其他国家，有必要在解决国际纷争中显示出日本的努力。

1990年代前半这一时期，国内正好是议论政治改革的时期，不安定的政权持续着。但是，细川、羽田两首相暂且不论，这一时期海部、宫泽、村山这样“鸽派”的首相接连出现，我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说这些首相们多少是意识到国民而被选上的话，那么这一现象就意味着日本国民不愿简单地抛却和平主义。但是，这也是日本的市民社会没有通过自己成立的政府对在世界上的角色问题上作出决断。我觉得所寻求的国内社会契约的重新缔结拖延到了将来。

日本的困难进一步继续。1995年是战后50年。在昭和天皇驾崩之际也产生了关于他的战争责任的议论，而正值战后50年，各方面进行了历史的总检视。而且，这一工作是置于冷战结束带来整个世界重新审视历史的动向，以及东亚各国显著的经济增长、自由化的发展的文脉之中。日本也被要求有一个统一地理解战前与战后的历史的叙事。丸山真男与司马辽太郎被广泛阅读，有着如此的背景。

1995年发生了阪神大地震以及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正如科学史家米本昌平所述，这两个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市民社会的安全这一概念。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意味，而且综合地包括了反恐对策、保健卫生、环境保护、灾害对策等。正因为如此，在对应综合意义上的“有事”的自卫队的行动方面，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实行立法。我认为这也使得日本的市民社会与政府间的社会契约的重新缔结提上了日程。2003年以后的一系列的有事立法的制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作出了应答，还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阪神大地震的悲剧也引发了很多的志愿者活动。不用别人说什么，很多人都抱着一种想尽自己所能的心情，并且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每天用摩托从大阪的宾馆向神户运送物资的作家田中康夫，在2000年长野县知事选举中参加竞选，成功当选。虽然他在任职知事过程中实现了多少的业绩还存有疑问，但是在此前被血缘、地缘、业界缘几重束缚的地域社会里，自发地成立了声援田中的多种多样的组织是个事实。很多人都认为，只有这样的自发性结社的相互支援，才是从国家自立起来的市民社会的存在的证明。

1998年，也实施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所谓的NPO法）。若名称为市民活动促进法的话，那么立法的主旨就更为明了了。我将1990年代的新的市民社会论的理念称之为“结社型市民社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市民政治的展望

这种结社的形成从建国以来就很盛行的，毋庸赘言是美国。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最先发现这一点的是 19 世纪法国的思想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他被置于结社型市民社会论的源流上。也有不少人指出在这一构想上托克维尔与丸山真男思想上有相似性。但是，我想更加关注于市民社会的政府形成能力的发挥。从这一观点来看，不通过选举而实现政权更替的市民社会原本是否存在呢？

前面已经讲到了，1990 年代的日本直面许多的困难。屡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我却认为是探求着什么的十年。那是对 21 世纪日本的新的国家形象的摸索。而存在于先，并肩负着这一重任的是日本的市民社会。已经迈入了少子老龄社会，有预测说今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将被中国超越。将重点放在经济的扩大上的以往的国家形象已经完全走到了尽头。我们原本通过社会契约将什么委托给了政府，这一政治的原点受到追问。我所讲的市民政治的必要性是这个意思。

细想一下，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日本的政治是小泉政治。安倍、福田、麻生三内阁也是 2005 年的邮政选举中自民党胜利的产物。其间，与美国从 2001 年开始的布什总统在任的两期八年经过了同样的时间。美国的市民社会已经选出了奥巴马新总统。日本的市民社会将通过市民政治权利的行使选择怎样的政府呢，我想关注一个多月之后的机会。

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摘要

第36回 SGRA 论坛 in 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日本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从“市民社会”到“市民政治”

2009年7月25日 信州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都筑勉

前言

高岛通敏编《现代市民政治论》(2003年)(包括高岛《什么是“市民社会”》、都筑《丸山真男的政治与市民》等论文);《高岛通敏集》全5卷(2009年)

1. 小说与电影中所描写的日本“资本主义型市民社会”

有“下女”、“小间使”、“女中”(女佣、女帮工)的家庭。

从夏目漱石《我是猫》(1905年)到《明暗》(1916年)。

野上弥生子《迷路》(1936—56年)。

丸谷才一《仅仅一个人的叛乱》(1972年)。

小津安二郎《茶泡饭的味道》(1952年)的厨房。

黑泽明《活着》(1952年)的市民课长。

2. “大众型市民社会”的成立

从1950年代后半期(昭和30年代)开始的变化。
高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中间阶层的扩大。

松下圭一《大众国家的成立及其问题性》(1956年)与《“市民”人间型的现代可能性》(1966年)。从“大众”到“市民”。

加藤秀俊《中间文化论》(1957年)。从“葫芦型”到“灯笼型”。

在60年安保中市民运动诞生。



3. “新的市民社会论”与“市民政治”的展望

1990年代(“失去的十年”)的论坛(参照都筑《隐性的市民社会——拖延了的社会契约的重新缔结》《社会科学研究》第58卷第1号、2006年)。

同时代的中国以及苏联认识。

中岛岭雄《邓小平胜利了吗》(1989年)。天安门事件与60年安保的比较。

下斗米伸夫《新俄国革命将如何展开?》(1991年)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斗争中,“市民社会”获胜。

政治改革。

佐々木毅《20世纪的政治体制的融解》(1990年)、《政治将走向何处?》(1992年)。“冷战结束了,而纷争的原因增加了”。

栗原彬《来自市民社会的废墟》(1993年)。“市民社会也又在明净与清洁中安静地腐烂下去”。

1995年,阪神大地震与地铁沙林事件。

米本昌平《震灾所截断的战后精神史》(1995年)。安全保障观的变化。

田中康夫《神戸震灾日记》(1995年)。志愿者。

1998年,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NPO法)施行。
对托克维尔和丸山真男的关注。结社论。

对历史的重新审视

加藤典洋《败战后论》(1997年)。跨越战前与战后的主体形成的问题。

日美安保的重新定义

伊丹敬之《“安全保障”萧条的日本》(1995年)。“第二个‘60年’”的必要性。

寺岛实郎《灵活安全保障的尝试》(1998年)。
在日美军基地的缩小以及向多国间地域安保的阶段转移。

检视小泉改革成果的2009年总选举。是否存在没有政权更替的“市民社会”?

报告 2



韩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从“民众”到“市民” ——殖民地、隔断与战争、开发独裁 与近代化、民主化

高熙卓（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SGRA 研究员）

大家好。在考虑韩国的市民社会时，最近议会上的乱斗骚乱成为国际性新闻，大的汽车工厂里存在着工会组织与非工会组织或者与国家的冲突，稍前一些，有卢武铉总统的自杀。若不从更深刻长远的观点来看在东亚以独特的形式推进着市民或市民社会的韩国社会的历史的话，我想是很难让您理解那种激烈的对立以及各种意义上的复杂的。我想将韩国的近现代100年左右的时间分为5个时期。

在都筑老师的报告里已经提到过，从1990年代出现了新的市民社会论。特别是哈贝马斯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对于以往的市民社会论作出积极肯定的评价。若将哈贝马斯式的新市民社会论中所提起的市民的观点，都筑老师的讲话中1990年以后的概念，即“市民”理解为对于目前秩序的政治性参加或抵抗的自律性主体的意思的话，我想在一般韩国社会中“市民”或“市民社会”并不为人耳熟能详。其有意识的使用是从20世纪末前后开始的。此前的所谓的民主化时代，指的不是“市民”，而是包括自任为其代辨者的民主知识人在内的“民众”。这是为什么呢？而且，20世纪末前后的变化意味着什么？有着怎样的背景呢？我想概括一下韩国近现代的知识大众的“时代性关心”，与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第1期：19世纪末——殖民地时期

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1期是19世纪末朝鲜王朝没落、被殖民地化的时期。围绕原因的解明和问题的解决等时代的关心，产生了两大潮流。一方面是，借用福泽谕吉的话，即注意到“有政府而无国民”的现状，由此追求独立、主权的国民国家形成的方法以及“国民”的形成。假设这个为A的话，A主要开展了启蒙、言论、学校设立运动等。

另一方面，特别是俄国革命以来，将独立的问题与此前在政治、经济方面受到阻碍的以人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论联动起来的潮流。提示了独立与阶级解放的“两

重课题”，若将此设为B的话，B主要开展了与下层阶级相关的运动。

在这第1期中的特征是，殖民地化的推进，更进一步，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的强压体制下，韩国人的殖民地体制的“同化”或“转向”的问题发生了。一般在国内展开活动，以体制内的接近为中心的潮流A中，这一现象显著地表现出来。这成为以后的所谓的“亲日派”问题的原因。

第2期：解放、隔断（1945）与战争（1950-53）时期

第2期是解放、隔断与战争的时期。美苏的冷战与隔断不仅带来南北领土的隔断，也带来南部理念的断层。“南北、左右对立”构造化，特别是在南方（韩国），通过民族统一政权的摸索将反共政权的创出作为第一目标，一般而言潮流A参与之或被包摄其中。其特征是，民主主义与法治的理念、制度等重要基础的构建。但是，这是以“反共”为目的的带有限制的东西。其中的问题一直拖到民主化时期。

一方面，潮流A中很显著的殖民地问题的清算被束之高阁，而另一方面，潮流B的则完全被排除和弹压，出现了一部分人与北方的合流，但是剩下的不得不在韩国中潜伏。特别是左右对立不单是理念的对立，而是增幅到生存的问题，战争的这一印象深深刻印在人们的心中。而且，战后，潮流B在思想上完全是禁忌，与赤色自卑的一般化的同时，“人民”这一词语本身成为死语。这也成为后来“民众”这一表达方式被选择的背景。直到今天，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围绕“亲日派”问题的“保守”与“进步”的激烈对立一直持续的温床，可以说是在这个时期构造化的。

第3期：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时期（1960-70年代）

接下来是1960-70年代的所谓的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由于朴正熙这一也为海外所熟知的总统的超凡支配，出现了由上而下快速走向潮流A的现象。他通过编入国际反共带的垂直性分工体系，而采取基于以出口为中心的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制定了到第4次的“经济开发5年计划”并进行了实践。其中，将“民生”标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通过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开发、农村改良运动，对潮流A采取了鼓励由下而上参与的方法。而且，开展了“国民教育宪章”和“新村运动”。经济增长与“民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但是政治上向“反共独裁”与长期执政倾斜。特别是采用了“韩国式民主主义”的表达方式，1972年开始了“10月维新”的独裁体制。

为此，遭遇到少数的大学生和知识人主导的对于独裁、长期执政的反对斗争，这时，在韩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潜伏着的潮流B被唤起。此时，朴总统在殖民地时代出身于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的“亲日”经历、通过军事政变而执政的不正当性、韩日邦交正常化中“过去历史”未清算的问题，或者为经济增长所不断阻碍、排斥的“民众”和“地域”的问题等交织在一起。

第4期：民主化时期（1987年-1990年代）

其后经历了朴总统的暗杀、全斗焕政权的独裁期，接下来就进入民主化时期。其标志性的事件是被称为“1987年6月抗争”的民主化运动。其特征是该民主化运动是“开发独裁的悖论”，也就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形成起来的“中间阶层”的孩童世代（大学生、白领）的反叛。

在1979年朴总统暗杀后的政治空白期，发生了对于偏远地区的“光州”的民主化示威的武力镇压（1980年的光州事件），而且趁此掌握政权的新军部政权的独裁成为反叛的契机。以后在韩国社会中带有偶像破坏性的反叛的民主化运动兴起，以往被视为禁区或者被束之高阁的问题被全部暴露出来，以对此进行全面挑战的形式而展开。

从历史的潮流来说，基于第3期中所唤起的潮流B，出现了所谓的“迟来的”马克思主义大流行的现象，民主主义本身也强烈地带有“民族、民众民主主义”的性格。而且，“亲日派”被视为问题，以往被认为禁区的对朝鲜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近感，以及与之对照的对美国的反感等在一般人们之间开始扩散。于是，正如宫岛老师的报告中也讲到的那样，“市民”被认为与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带有否定意义的资本主义是同样的，并未予之那么重要的位置。

但是，在那样的状况下，在考虑市民社会或者市民的时候，我认为作为分水岭要求总统直接选举的“1987年6月抗争”的成功极为重要。那可以说是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潮流A的完成，但是这一时期也是由此“民众”自己的政治性参与日常化，以往被独裁所压抑的潮流B的政治、或者经济性要求的爆发性喷发的动态位相也表象出来的时期。

虽说如此，我还是认为对于“市民”的关注与评价的转换点在“1987年6月抗争”。1987年的民主运动的成功，不仅是专心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以往的“运动圈”，也是所谓的“非运动圈”的一般大学生和被称为“领带部队”的公司职员们的大众性参加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在我看来，那象征着韩国社会的“市民”或“市民社会”的出现（C这一新的潮流的出现）这一构造性变化。这一新的潮流之后以1989年“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的创设活动为开端，与各种各样的市民团体的登场和活动连接在一起。

后民主化时期（1990年代以后）

那么，1990年代以后怎么样呢？虽说是试探性的讨论，我想陈述一下自己的展望。在1990年代以后的韩国社会，参加民主主义，即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主义的参加已经一般化了。而2000年，制定了“非营利民间团体支援法”，我认为更加具备了对于新的潮流C的有利的条件。大家都熟知的蜡烛集会和卢武铉总统的“参与政府”的出现就是其象征。

但是，反抗“参与政府”而高举实用政府的现政权的执政，2006年现在市民团体只有5000多个，且被称为“没有市民的市民运动”的现象，我想对之也必须加以思考。这种状况暗示了什么呢？我想在结语的部分考察一下。

一方面，民主主义、法治的制度性固定，由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全球化的推进，多样国籍者的流入等，可以说韩国社会已经是价值与利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因为在这样的状况下，现政权的执政以及“没有市民的市民运动”的现状，是对“市民团体”的所谓的从生活世界而来的“无言的回避”的结果，这些“市民团体”倾向于基于B的范式的原理主义性的接近和政治万能主义式的姿态。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现在的韩国社会，从生活世界中站立起来，摸索与此前不同的“市民”的形成及活动是个课题。

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对于“参加民主主义的悖论”多加关注呢？在多样的价值与利害对立存在的社会中，我觉得如何调整和管理纠葛与对立是关键点。但是，单方直接行动的模式会招致他方的直接反抗，有时包含有产生直接冲突的危险性。历史性地来看，这会带来使政治性混乱增幅以及一般人们脱离政治化的危险性。还有，也包含有大众社会的同一步调现象和排除少数人、他者的危险性。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韩国社会的市民或市民社会，大而言之，迎来了从潮流B走向潮流C的摸索期、过渡期。

以上，包括对未来的展望，就韩国的市民社会以及21世纪的课题进行了考察，我的报告完了。

摘要

第36回 SGRA 论坛 in 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韩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从“民众”到“市民”——殖民地、隔阂与战争、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民主化

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SGRA 研究员 高熙卓

0. 问题提起

如果“市民”意味着对于目前的秩序作出政治性参加或抵抗的自律性主体的话¹，那么，一般韩国社会中“市民”或“市民社会”并不那样耳熟能详。因为其有意识的使用是从20世纪末前后开始的。

在此之前的所谓民主化时代，其意义的担当者不是“市民”，而是“民众”（包括自任为其代言者的民众知识人）。

那是为什么呢？还有，20世纪末前后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其背景是什么？我想概括一下韩国近现代的知識大众的“时代的关心”来思考这些问题。

1. 19世纪末——殖民地时期

随着朝鲜王朝的没落与殖民地化（1910），围绕其原因的解明和问题的解决，大而言之，产生了两大潮流。

一方面，注意到“有政府而无国民”的现状，试图找到独立、主权的国民国家形成的途径与“国民”的形成的潮流（A）。主要是启蒙、言论、学校设立运动等。

另一方面，特别是俄国革命以来，使独立问题与在政治上、经济上被疏远的“人民”为主体的阶级革命论连动起来的潮流。“两重的课题”（B）。主要是下层阶级运动。

殖民地化推进，以及亚洲、太平洋战争期的强压体制中，“同化”、“转向”的问题。一般而言以国内、体制内的接近为中心的（A）显著。所谓的“亲日派”问题的原因。

2. 解放、隔阂（1945）与战争（1950-53）时期

美苏的冷战与隔阂，不仅带来了南北领土上的隔阂，还带来了南方的理念上的隔阂。“南北、左右对立”的构造化。

在南方（韩国），由于摸索民族统一政权，反共政权的创出成为第一目标，一般（A）参与之或被包摄其中。民主主义以及法治的理念、制度这一基础的构建。但是，带有以“反共”为目的的限制事项。由此引起的问题一直影响到民主化时期。

一方面（A）中显著的“殖民地问题”的清算被束之高阁，而另一方面，（B）遭到排斥和弹压，一部分人向北方合流，但是在韩国这不得不潜伏起来。

特别是不将左右对立作为单纯的理念对立，而是

一般作为生存的问题增幅，战争的这一印象刻印下来。战后，（B）成为思想上的禁区，赤色自卑的一般化的同时“人民”成为死语。

成为直到今天，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认识、围绕“亲日派”问题的“保守”与“进取”的激烈对立一直持续的温床。ex.（B）的《解放前后史认识》（1979）、“反民族问题研究所”设立（1991），（A）的《解放前后史再认识》（2006）

3. 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时期（1960-70年代）

朴正熙总统的强力支配带来的由上而下的向（A）的疾走。

通过编入国际性反共带中垂直分工体系而基于以出口为中心的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战略。ex.1—4次的“经济开发5年计划”（1962-1981）

将“民生”高举为重要的政治目标，通过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开发、农村改良运动动员由下而上的参加。ex. “国民教育宪章”（1968）、“新村运动”（1970）

经济增长与“民生”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但是政治上倾斜于“反共独裁”与长期执政。ex. “十月维新”（1972）与“韩国式民主主义”

另一方面，遭遇由少数大学生、知识人的反对独裁、长期执政的斗争。其时，朴总统的“亲日”经历、通过军事政变的执政的不正当性、韩日邦交正常化中“过去历史”未清算、被经济增长所疏远、排斥的“民众”与“地域”问题等纠结于其中，唤起了在隔阂、战争期不得不潜伏的（B）。

4. 民主化时期（1987年-20世纪末）

“开发独裁”的悖论。遭遇由经济增长而逐步形成的“中间阶层”的孩童世代（大学生、白领）的反叛。

朴总统的暗杀（1979）之后，在政治空白期对在偏远地域“光州”发生的民主化示威的武力镇压（光州事件、1980）、趁机获取政权的新军部政权的独裁成为其反叛的契机。

带着偶像破坏式的反叛的位相，作为对此前的禁区以及束之高阁的问题的挑战而展开。基于被唤起的（B），“迟到了的”马克思主义流行现象、民主化要求也有着“民族、民众民主主义”的性格。“亲日派”的问题化、对朝鲜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近感、对美国的反感等。为此，市民被与带有否定含义的资产阶级等同而视。（cf. Hegel, Marx）

作为其分水岭，寻求总统直接选举的“1987年6月

1 哈贝马斯《公共性的构造转换》1990、第二版。请参照序中涉及到的“新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抗争”的成功。完成由下而上的（A）。

在其延长线上，“民众”自身的政治参加的日常化，此前因独裁而被强制的“B”的政治、经济的要求的爆发性喷出的位相。ex. “劳动者的大斗争”、农民斗争、全国教职员劳动组合（全教组）结成等。

但是，对于“市民”的关注与评价的转换点也是从“1987年6月抗争”开始的。其成功的要因，是“非运动圈”的一般大学生与“领带部队（=白领）”的大众参加，但是，那也是韩国社会中出现“市民”与“市民社会”（C）这一构造变化的象征。其潮流以“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的活动为开端，与“环境运动联合”（1993）、“参与连带”等各种各样的市民运动的登场相关联。

5. 后民主化时期（21世纪）——结语

韩国社会的参加民主主义是一路扩大。更进一步，对于（C）的有利条件通过“非营利民间团体支援”的制定而逐步具备。蜡烛集会、“参与政府”（2002）的出现是其象征。

但是，由于对于“参与政府”的反抗，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标榜“实用政府”的现政权执政。另一方面，市民团体只有5500多个（《2006年韩国民间团体总览》），而且呈现“没有市民的市民运动”的现象。

这暗示了什么呢？在民主主义与法治的制度性固定、持续性经济发展带来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全球化的进展、多样的国籍者的流入等价值与利害的多元化推进之中，不就是对于（B）的政治万能主义式的接近、倾向于与原理主义的对决的“市民团体”，从生活世界开始“无言的回避”吗？要求从生活世界站起来的“市民”团体与活动的摸索。

另外，也应该关注参加民主主义的悖论。一方面，多样的价值与利害的对立产生直接冲突的危险性，从而导致政治性混乱的增幅与脱政治化。另一方面，大众社会的同一步调现象与排斥少数者、他者的危险性。（cf. 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德国）



问答

■ 宫岛

韩国在承认外国人的地方参政权、实施外国人基本法等法制化方面，给人一种比日本还要前进的印象，但是，这是表示自下而上的民主主义还是表示自上而下的决定呢？这方面可以看作是市民运动的表现吗？我想就此问一下。

■ 高

我自身属于政治学科，已经习惯于这一点了，但是实际上我的专业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可能对于韩国那方面的情况并不比您详细。刚才听了您的报告，我的感想是：“是吗？好像什么时候在报纸上读到过。”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回答可能是个人的和主观的，我认为是由下而上的压力很强。也就是说，在长期不得不潜流的B爆发性喷发的时期，其力量里有种势头，但是，B确实在其底边有着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对弱者的关怀，即便对于移居者，在这种视点里也有着来自市民运动的压力。

■ 平川

听了三位老师的报告，我十分受益。第一个想向宫岛先生提问。就我理解，您在报告中指出，欧洲经验是在结束战争后视点移向人权，由此出现了欧洲统合的动向。但是，在亚洲，人权虽然非常重要，而如果存在亚洲式的行进路线——Asian Way的话，是不是只有欧洲式的方向呢？您在这方面是怎样考虑的呢？亚洲在战后不得不背负着历史性的课题，即首先必须从建立国家开始构筑国际关系。那与所谓的内政不干涉的想法相连，在今天出现了相反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因为不是国家，所以进不了ASEAN+ 3之中。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将怎样来描画亚洲的未来像才好呢？

都筑教授的报告非常有趣，与宫岛教授的报告正相对照。在考虑市民时，在战后呈现出这样的构造，即成为了日本国内的市民问题，而国际性的市民的关系完全消失。然而，70年代以后，日本在经济领域的国际化成为问题。那与市民概念又如何相关呢？今天的报告中这一部分几乎没有。宫岛教授与都筑教授虽然有着相同的



出发点，但是给人的印象是市民这一概念出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一问题该如何思考呢？我想请教一下，国际化与日本的市民概念的关系如何。

宫岛

我并不是这样来理解都筑教授的报告的。并未考虑到对立什么的，我想其后都筑教授将会来回答。

针对我的提问，我只想说的是有必要确认这一点，即亚洲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反民族主义，在出发点上两者存在着差异。我想强调的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好，不如说是欧洲的民族主义是欧洲人感觉到了问题。

在亚洲，由于受殖民地支配，各国都肩负着独立的课题，所以民族主义以及恢复民族的骄傲，或者确立自我认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过程。只是由于过去了半个世纪，今后在思考亚洲中的统合时，我觉得在这里重新展望一下欧洲也可以成为一个参考。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过后的公开座谈讨论会上我们再来探讨吧。

还有，在都筑教授的报告中，比如提到了“越平连”，我觉得这是日本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将视线投向日本以外的表现。

都筑

我觉得您说到了我报告中最脆弱的部分。我迄今所喜欢阅读的战后日本的思想家们在就日本的市民社会进行议论时，还是一直将Nation（国民国家）放在对立的一面加以思考的。所以，是市民社会主义者的同时也应该是国民国家论者。那是非常教科书式的理解，或许惹怒了宫岛教授，但是，市民开始称为国民是在法国革

命后，原本国民国家与市民，或者市民阶级是有着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的。在日本的文脉中来思考市民以及市民社会时，首先应该彻底努力对抗的，一个是绝对主义，一个是法西斯主义，而与绝对主义、法西斯主义对抗，或者从其专制性的支配中自立起来是市民社会的课题。但是，我觉得那是与建设国民国家不相矛盾、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起来的一种形式，有种预定调和的东西存在。

所以，我今天的报告也是由于学习不够而成为相当内向型的谈话，但是在战后讲述到市民与市民社会的文脉中，比如像明治维新前后福泽渝吉他们所谈到的国民国家的自立与独立，在战后被重新讲述。那么，究竟是何时转机来临了呢？我觉得，比如说在 1980 年代，在经济领域日本的国际化受到质疑，对亚洲重新缔结关系的必要性凸显了出来。

我想这也将成为过后公开座谈讨论会时的话题，比如丸山真男说“战后日本开国了”。这是说与战国时代、明治维新相匹敌的战后的第三次开国，在我的印象里，不如说对于亚洲各国，因为有战争责任等问题，战后暂时未能缔结关系。并非进行了锁国，开国一事是否在 1945 年以后马上就可以说呢？我觉得是一直拖延到 1980 年左右。所以，在 80 年代以后，曾经的日本帝国主义式的统治是什么？战后是否将其彻底清算了吗？这些问题开始重新受到审视。

报告 3



菲律宾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菲律宾的“市民社会” 与“不良撒马利亚人”

中西 彻（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曾被称为菲律宾贫困的象征的Smokey Mountain虽然在1995年就已封闭，但遗憾的是Smokey Mountain的对面出现了垃圾场，而且现在竟然居住了2万人之多。实际上，这种贫困的状况在菲律宾并不少见。

在贫困阶层占绝大多数的菲律宾，“市民”这一词语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如何行动起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今天，我想就这个问题来思考一下。也就是说，我想谈一谈若将“市民社会”定义为“People's Organizations联合起来，为获取‘市民’的权利和自立而建构的网络集合体”的话，那么，菲律宾的贫困阶层要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或者形成为寻求自立的网络的“市民”，要怎样行动起来才有可能。不过，对于市民社会论，我完全是个外行，在菲律宾现在仍在进行着围绕新中间层的新市民社会论的讨论，我不能深入进行这些讨论，在此表示歉意。

SGRA | 21 | REPORT



图1 菲律宾的贫民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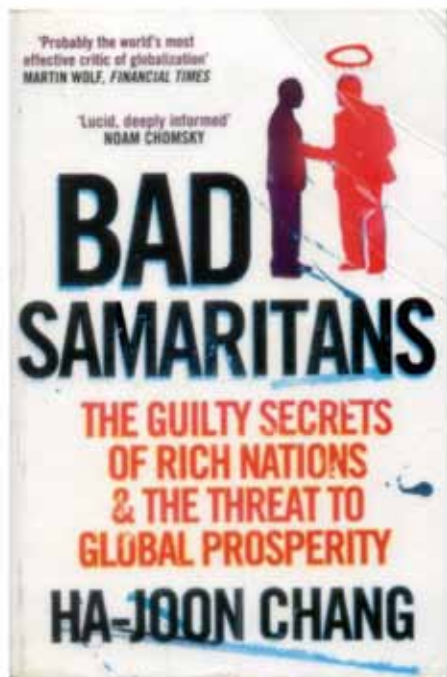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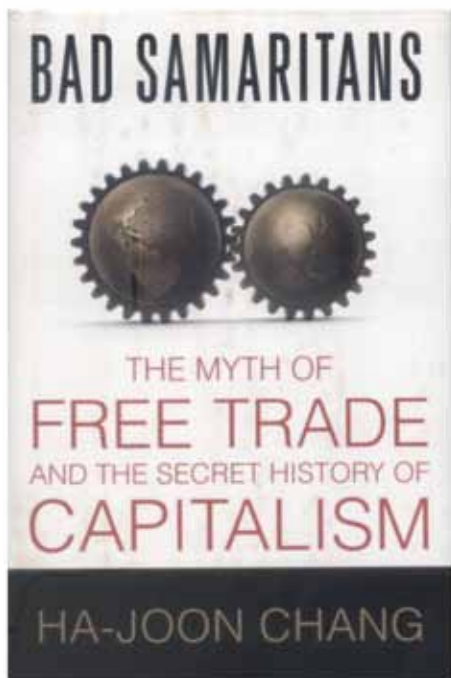
不良撒马利亚人与“踢开梯子”

标题“不良撒马利亚人”有些怪异，但是当然这是针对圣经里的譬喻“善良撒马利亚人”一词的。2007 年剑桥大学的 Ha-Joon Chang（张夏准）先生写下“Bad Samaritans: 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and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我深感肺腑。这本书成为了畅销书，但是就我所知，听说在韩国被指定为“不受欢迎的书”。然而，在韩国这也成了畅销书。据说该书在美国也在五角大楼中受到禁止阅览的处分。之所以专门举出这本书，是因为我认为这本书所说的“不良撒马利亚人”在思考菲律宾的市民社会时非常有参考价值。

圣经上“善良撒马利亚人”的逸闻，一言以蔽之，就是虽然预想到自己会受到损失，但是还是去帮助人们的行为。人们一直认为这一行为是基督教的一个理想。所以，“不良撒马利亚人”就我的解释而言就是表现出帮助人们的样子而来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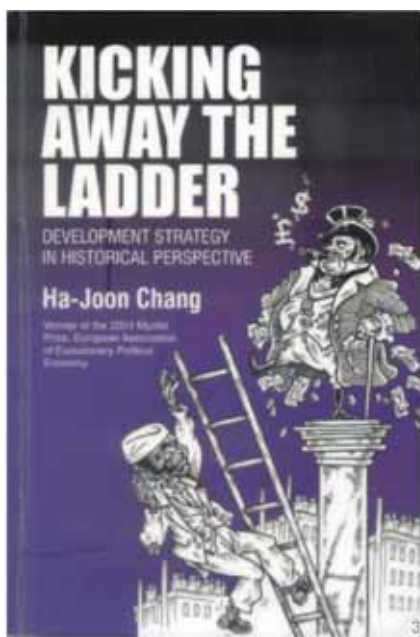
在张夏准先生的议论中，实际上世界银行、IMF、WTO 或者发达工业国进行的就是这种行为。这当然也包括日本。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踢开梯子”的行为。

“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本身是 Alfred Marshall（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是指赶走想从后面追上来的人们。在这一标题的书中，张夏准先生指出：“发达国家曾经在开发初期实施了保护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但是，一旦掌握了霸权就宣称自由化。然而，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就要求他们从发展初期阶段自由化。”所以，由于这一议论基本上是从正面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听说得到诸如 Joseph E. Stiglitz（约瑟夫·斯蒂格利茨）、Noam Chomsky（诺姆·乔姆斯基）的很高的评价。



Chang, Ha-Joon (2007),
*Bad Samaritans: 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and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 Business Books.

图 2 Bad Samaritans



Chang, Ha-Joon (2003),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张夏准(2003)《过河拆桥：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Anthem Press.

图3 《过河拆桥：历史视野中的发展战略》

这与讨论菲律宾的问题有何关系呢？作为初期条件，存在着社会阶层的固定性（图4）。据说在菲律宾地主与资本家占有70%左右的财富。在拉丁美洲关于土地所有的基尼系数为0.9左右，就是说不满1%的地主拥有99%的土地，菲律宾还不至于如此。但是，可以想见这是一个由身为地主、资本家的少数人群与占大多数的贫困阶层或农民构成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底层的人们能否作为市民独立是今天的主题。

我进行讨论的另一个观点是政治学的James Scott（詹姆斯·斯科特）先生所写的“Seeing Like a State”（中译：《国家的视角》）一书。这里将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进行讨论。一个是simplification一词，是为了让政府容易统治而创出让人容易看懂的重视效率的体系的意思。虽然乍看上去很有效率，但是实际上相反，占大多数的市民们所创出的“民众知”遭到破坏。各种各样的事例表明这一点正是很多发展政策归于失败的原因。

今天我的报告里有一个主题是贫困阶层能否成为市民，但是我在想这里想强调的另一点就是贫困阶层的人们决不是劣等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自身拥有着非常具有实践性的“民众知”。以某种形式将之纳入其中的开发才是理想的，这一点可能是大家的共识。

两阶段“踢开梯子”假说

这里就来谈谈两阶段“踢开梯子”假说。第一阶段是发达国家“踢开”发展中国家的梯子，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着富裕阶层“踢开”贫困阶层的梯子的现象，所以遭受双重“踢开梯子”的是贫困阶层。

这种Bad Samaritan的人们所抱有的基本想法是，就贫困阶层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稍微改善一下贫困就可以了。如果项目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获得利益的话就更为理想。但是，不能给他们创造能够追赶上来的环境。一想到以那种形式所进行的“援助”，我觉得几个援助很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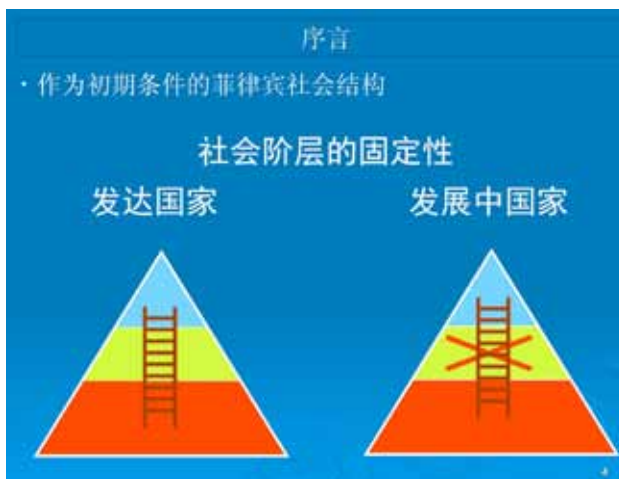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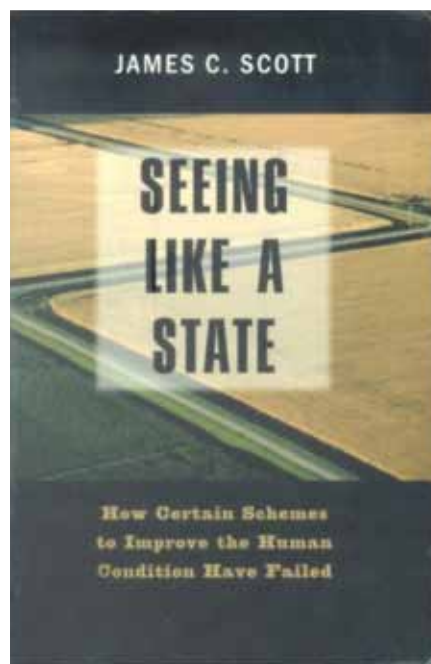


图4-5 作为初期条件的菲律宾社会结构

Scott, James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图6《国家的视角》）

两阶段“踢开梯子”假说的第一阶段是张夏准先生的议论的转卖，Bad Samaritan 是 IMF、世界银行、WTO 等国际机关、支持其的发达国家。我在这里添加的是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国内。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与支持其的富裕阶层实际上作出重视增加贫困阶层收入和改善国内收入分配这一深明大义的样子，而实际上有可能巧妙地制定出反而阻碍贫困阶层追赶上的制度。

在这样的制度下，在菲律宾，贫困阶层将永远不能从贫困中摆脱出来，也不可能作为市民社会的个体登场。

不良撒马利亚人的“市民”设计

A：农业——“绿色革命”

今天我想讲述两个“双重踢开梯子”的事例。一个是非常有名的开发援助，叫做“绿色革命”。因为挽救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前些日子去世的 Norman Borlaug（诺曼·博洛格）博士作为“绿色革命”的核心领导人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在开发经济学中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其问题点。

这个项目是大米的单一栽培，基本上都是 F1 品种。原有的品种生产性很低，所以要开发高产量的品种。由于稻的高度低，所以与原来高度高的品种不同，即便遇到台风也不倒伏。由于感光率低，所以即便受光照射叶子也不会过分繁茂或长得过高。由于具有高度的耐肥性，即便施加肥料，虽然会有很多穗，但是茎叶也不增长。而且早熟，特别是如果是季风型气候的话，一年三作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很花费，需要大量的水，灌溉排水设备和围场设备是不可或缺的。必须以成套地来散布化学肥料和农药。也需要农业机械。虽然当初由于花的费用过多，农民负担很重而遭到批判，但是最近就其持续可能性的问题进行着讨论。关于这一点，后面再

详述，这里想关注两点。一个是农业机械、化学肥料和农药等生产资材以及圃场整備需要庞大费用。另一点是高产量品种现在几乎都是F1品种，所以要从获取了专利的种子公司采购种子。人们指出，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农业相关产业赚钱的构造。

B：教育——为了万人的教育

想举的另一个事例，我觉得不是像“绿色革命”那样坏的事例，是“为了万人的教育”（Education for All）的想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达卡尔行动框架”（Dakar Framework for Action）中所宣称的，在目标中，也特别举出初等教育（读写）的重要性。由于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认同，所以完全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我觉得有种想法存在着，即只要完成这个Education for All，对于教育的援助就可以了。我想说的是，Education for All只是必要条件，是非常重要的援助，但是，此后是不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呢？

将“点”连接起来

A：农业

回到刚才提到的“绿色革命”的例子，Bad Samaritans的情况之一是“画一化”（simplification），刚才Scott的例子中谈到了。所谓画一化，是指由于追求效率而投入F1品种与化学肥料的结果，作为其成本，引起了生物多样性与持续可能性等问题。

在此之前，通过农家之间的交换将种子保护下来了，但是，会变成一种种子或者少数的种子，这样就会失去生物的多样性，长期下来会出现对于病虫害的抗病力变弱的可能。而且，由于多投入化学肥料和农药，地下水枯竭而引起盐害。在孟加拉国也发生了出现砒霜的事例。由于这种“画一化”的推进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费用，有关这一点最近很多都明晰起来。

另一点是结构性空隙的问题。农业相关产业与农民们实际上结成了1对1的网络。每年必须购买种子。由于此前农民们所进行的种子交换不存在了，所以农民间的社会关系是不是逐渐变坏？那样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阻碍自律的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呢？这是我的看法。

结构性空隙是说A与B与C正好相当于与异性脚踩两只船的状况，如果这样思考的话就容易明白了。这时必须注意的是自己与脚踩两只船的对方之间要创造出空隙不让其会面。A是农业相关产业，B与C是农民，这样，农业相关产业与农民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空隙。比如，A这个人知道B这个人想卖电脑、C这个人想买电脑。但是，如果知道B与C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话，恐怕A想从B那里尽可能便宜买进，再尽可能高价地卖给C。这是最好的。我想这实际上是商社所做的，从社会上来看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在互相认识的社区中干的话，就不是人了。

如果有了结构性空隙，同时意味着会成为商业机会，所以农业相关产业不会将之置之不顾。这样的事情成为可能，屡屡发生，这是第二点。

更进一步，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替代物的话，或许“绿色革命”也是为了粮食的增产，没有办法，但是实际上是有的。那就是SRI（System of Rice

4. 连点成线 (connecting dots)

结构性空隙 (structural ho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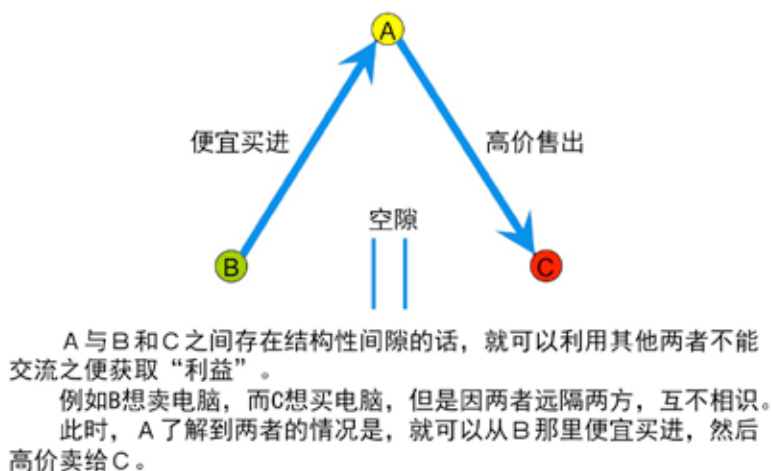


图7 连点成线 结构性空隙

Intensification)，这是康奈尔大学的 Norman Uphoff（诺曼·厄普霍夫）先生一心普及的农业法。

这是 1983 年，耶稣教会的法国人 Henri de Laulanie 神父在马达加斯加岛所构想的农业法，实际上是依据日本的农业经济学家片山佃德的分蘖理论。一言以蔽之，将发芽后 2 周左右的苗（幼苗）分出间隔种植一棵，初期除去很多的杂草，进行间断灌溉。这是或加水或放干，防止杂草繁茂，培养地里的真菌的想法，需要当地的技术和知识。虽然有程度的差别，但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们也多少知道一点。虽然是“绿色革命”所夺去的智慧，但是如果掌握了“民众知”的话，由此可以夺回他们传统的技术。

这种农业法的优点在于不挑品种。因此，可以不用买 F1 品种。也没有必要散布化学肥料和农药。但是需要堆肥。也因为出点子的人当时在场，据说在马达加斯加岛产量提升到接近 10 倍。这需要十分娴熟的技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会产生差别，所以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效果。所以，有地方产量是 2-3 倍，也有 5 倍以上的地方。

我就此确信了“踢开梯子”，是在 IRRI（国际稻研究所）最先作出反应，发表了论文“在国际稻研究所的实验农场进行试验，结果发现 SRI 没有效果”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要使 SRI 成功，必须要有娴熟的技术。还有，由于还不知道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所以如果 IRRI 能发挥本来的角色的话，我想正是应该研究这个原理，但是，没有提及这一点，现在也是处于完全无视的状态。

现在 SRI 并没有确切的理论来证明这种农业法的高生产性，虽然还处于试行摸索的阶段，但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这是恢复农民们的种子交换和劳动力交换，恢复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农业法。我认为这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此前依赖于机械、农药和除草剂的东西开始变为依靠他们自身的劳动，自律的农业协同工会的基础也建立起来了。

我们认为这些状况实际上与市民社会的充实相关联，但是，妨害市民社会形成的不就是Bad Samaritan吗？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假说。

B：教育

关于教育，简单而言，菲律宾近乎百分之百的人完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也在贫困阶层中十分普及。但是，刚才也提到，虽然优秀但是不需要高等教育的想法在Education for All中忽隐忽现。

比如在菲律宾，菲律宾大学在国内是最优秀的学生们去上的大学，但是那里有的系几乎没有奖学金制度。我一直研究城市的贫困阶层，从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25年左右住在一个贫民窟，与他们一起生活，就在3年前，这个贫民窟4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考上菲律宾大学的人。他既没有去补习班，没付出什么努力就考上了，但是问题是他想放弃入学。原因是没有奖学金。学费也不是那么贵，就是因为交通费不够，差一点就放弃入学。得知这一点的NGO连忙筹集资金，把手续办好让他去上学。

虽然这样的情况或许很少见，但是我想如果能够去补习班，或者能够确保安静的环境的话，贫民窟中会有很多孩子们有可能上菲律宾大学。确实Education for All是有必要的，但是，实际上所做的是妨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者与社会活动所必需的人脉的联结。我想强调的是从贫困阶层中选拔出来让他们充分认识到地域贡献的必要性是很重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社区大展才能的地方，实际上在现在菲律宾的贫困阶层中的社区，有着能够实现的可能性。

实际上，上了菲律宾大学的小伙子在交通费上得到了援助，将来会以某种形式返还。现在，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就以补习班的形式教孩子们，作为一群年轻人的领头人专心于社区活动。这从他高中以前那种畏缩不前的性格来看是无法想象的。如果很好地将制度得以完善，在社区中也进行精英教育，将来他们成为市民发挥力量时是不是能够得到必要的诀窍呢？如果从菲律宾大学毕业的话，当然，可以培养出横跨阶层的人脉，也可以提供贫困阶层地区间的平台，所以可以培养地区内的领导。我觉得这与网络的深化相关联，能够对市民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

以上是我的报告。开始的时候介绍了自己刚听说的不良撒玛利亚人的行为，但是，其实从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援助的话，我想无论是从市民的观点，还是从市民社会的观点来看，都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报告 4



台湾、香港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被“国家”所愚弄的“边境东亚”的“市民”

——脱殖民地化、脱“边境”化的纠葛与自我认同的探索

林泉忠（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琉球大学准教授、SGRA研究员）

我今天就台湾与香港的市民社会的特征进行报告。首先就标题作一下说明。“被‘国家’愚弄”是因为台湾与香港在近代以后至少经历了2次以上的主权归属的变更。这也包含所谓的“祖国复归”。“边境东亚”是我造的词语，也用在4年前出版的书的标题上了。在各种各样的制约之中，台湾与香港的市民社会是以何种形式发展的呢？特别是所谓的脱殖民地化、或者脱“边境”化的纠葛、自我认同的摸索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概括一下今天报告的内容，有以下4点。

第1点，通常在说到市民社会的时候，是指主权国家的市民社会，但是，在国家形态暧昧，有时原本不是国家，或者被置于殖民之下的地区中，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否可能？这是一个大的课题。第2点，经历了殖民地时代的台湾与香港，在各自的年代，其市民社会的形成有着怎样的特征呢？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3点，被置于特异的“国家”体系中的“祖国复归”的台湾与香港是如何直面脱殖民地化的困难的呢？通常殖民地的结束会采取建设独立国家的形式，但是，台湾与香港以特殊的形式复归了祖国。在这样的地区，在所谓的后复归祖国时代，是如何直面着脱殖民地化的困难呢？而这给这两个地区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最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市民运动与民主化要求、自身的自我认同的摸索是如何连动的呢？

以上是我今天报告的4个要点。通过今天的报告，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解答或者解答的启示。

“市民社会”与殖民地

首先，就“市民社会”与殖民地的关系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市民社会”实现的要件有很多，就我理解而言，自由的社会环境的保障与作为“市民”的自觉和政治参与是重要的一点。那么，被置于殖民地支配体制下的殖民地地区，市民社会的形成有可能吗？

我的结论是，既然是殖民地支配体制，无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但是就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来看，其一部分在殖民地时代也是可以形成的。但

是，作为置于殖民地支配体制下的这种市民运动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先天的浓厚的反殖民地支配体制的性格。

殖民地台湾“市民社会”形成的开始：1920年代的社会运动

台湾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末期由清朝割让给日本，是日本最初的殖民地，一直持续到1945年。从1895年开始的大约20年间是武力抗争的时代，但是，从1920年代开始从硬性的抵抗转变成柔性的抵抗。我想，通过和平手段追求平等或者权利，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自觉运动的开始呢？

在这个时代，涌现出众多的文化性组织与政治团体。比如，有台湾农民工会、台湾工友总联盟、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台湾共产党，而其中特别是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是重要的存在。台湾文化协会是以林献堂为中心而结成发展起来的，林献堂在台湾社会地位很高，蒋介石初访台湾时与之会面。到了1927年，台湾最初的政党——台湾民众党以蒋渭水和蔡培火等为中心结成了。其内容在于讨论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存在方式，消除被置于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与日本本土之间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差别，更进一步提出政治参加的要求。而其中特别是设置台湾议会成为重要的课题。

这一时期的台湾市民运动的特征有以下3点。第1点，与殖民地支配体制的合作关系是矛盾的。比如，殖民地政府方面承认台湾民众党结成本身，警察方面也认同台湾民众党召开讨论会，但是，警察方面会坐在末席进行监视。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其内容还是关于对支配体制的反对与抵抗或者是要求缓和支配体制，所以我想可以认为内里包含了与殖民地支配的矛盾。

更进一步，这一时代在台湾兴起的运动与母国（中国大陆）未发生连动是一个特征。运动中的一部分人（比如蒋渭水）也参加了大陆的革命，但是没有特别的连动。



图1 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成立时期的主要成员。前排右数第四人为林献堂总理。（出处：林柏维《台湾文化协会沧桑》、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年）

图2 日本统治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台湾杂志《台湾民报》。(出处：『孙学研究学报』23号)



还有，我所关注的另一个特征是，很多的民间组织与刊物的名称上附有“台湾”一词。刚才提到的台湾文化协会和台湾民众党也是如此，此外，刊物有《台湾青年》、《台湾民报》、《台湾战线》、《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我认为，让“台湾”这一名称堂堂正正地出现不也表明了自己的自我认同吗？

这一时期活跃着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的特征是，以利用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这一近代性手法，试图构建全岛的互联网和集聚广泛的社会资源，进一步追求在权利要求与被压迫民族的自觉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与和平。因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市民社会形成中所常见的要素，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市民社会形成的动向。

但是，市民运动的要求与殖民地支配体制的矛盾一旦深化，殖民地支配方面就抱有危机感，最终开始进行取缔。而进入1930年代，突进到战时体制，或由于“皇民化运动”的展开，台湾最初的市民运动遭受挫折。

在殖民地香港“市民社会”形成的开始：1967年暴动后的展开

香港的市民社会形成的开始相当晚，是在1960年代以后。

不能忘记的是，即便在1842年因南京条约由清朝被迫割让给英国成为殖民地后，香港与中国本土的国境一直开放且可以自由往来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949年。其后也由于很多中国本土的人员流入香港，在香港定居的人口安定下来，而出生于香港的人口过半数则是在1965年。由于人口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很难形成自己的社会，所以我认为可以说是在1960年代以后香港终于获得了人口稳定下来形成自我的社会的要件。

1967年在香港爆发了自英国殖民地体制开始以来的最大的暴动。这被认为是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连动的反英暴动。所以，我认为香港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在1967年或者1970年代以后展开的。另一点，1980年代初期回归问题提上了议事日

程。香港市民对未来抱有危机感，向着民主化要求或者保障自身权利的方向推进市民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1960年代至70年代起开始形成“香港是我家”的共同体意识。在香港，人口是流动的，这里原本被认为是暂时居住的场所，但是从1960年代起开始认为香港是我家，有着形成自我的社会的性格。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压力团体，1980年代以后政党也出现了。其中特别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汇点、民主同盟很重要。民主同盟是香港民主党的前身。这一时期市民运动的内容包含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殖民地市民的福祉与地位的提高、中文的公用语化运动等。

这一时期的特征首先是与殖民地支配体制的微妙的关系。香港被认为是特殊的殖民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保障了包括言行的自由、报道的自由等在内的高度的自由。这在某种意义上维持了与殖民地支配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第2个特征是市民运动与祖国未必连动。虽然也有从1960年代末开始的保卫钓鱼岛的连动，但是，那与其说是市民运动，不如说是民族主义运动。第3个特征是通过市民运动终于形成了香港人的自我认同。

回归后的特别的国家体系与脱殖民地化的困难

在结束殖民地的形态上，香港与台湾有着特殊的体验。即并非建设独立国家，而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实现了很特别的“祖国复归”。这里的“祖国复归”的意思，在台湾是指1945年的“光复”，在香港是指1997年的“回归”，我觉得两者分别被置于特别的国家体系中。

当然在内容上有着相当的差异，而台湾问题上有两点很重要。一个就是战后初期（1945-49年）复归中华民国了。中华民国与台湾虽然一体化了，但是其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影响很大。“亡国迁占者国家”这一用语是指支配现地居民的亡命移居者所建立的国家的国家的意思，在政治学上说这正是战后1949年以后的台湾的状况。



图3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典礼
（出处：因特网图片）



在香港，傍晚的电视新闻之前，必须播放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短片。 PDF8

香港的情况稍有不同，在复归祖国后，在与本土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下，成为所谓的“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

一般认为，作为脱殖民地的前提，不平等的旧支配体制的解体与自身成为主人公的新支配体制的确立不可或缺，但是台湾与香港各不相同。台湾从日本的殖民地支配转变成以外省人为主体的独裁体制，而香港虽然最高支配者改变了，但是几乎维持了复归前的旧支配机构。为此，复归后的台湾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香港政府都未提及“脱殖民地”，而是一味地倡导“爱国”。

民主化时代的台湾的市民运动

下面简单地看一下民主化时代的台湾的市民运动。1990年，发生了要求全面改正国会的学生运动，最终实现了。同时期受到压迫的弱势团体结成起来，原住民、客家、女工、同性恋者分别站起来主张权利，那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近年，“社区”意识的高涨，以及包含政治性参与、市政、环境、语言等在内，议题呈现多样化。



香港回归10周年的游行
(出处：因特网图片)

后回归期的香港的市民运动

后回归期的香港的市民运动，首先政治性参与的要求高涨是一大特征。特别是2003年，被认为威胁到香港市民权利的“23条”立法，在市民团体的奋起下而被阻止，提出了普通选举的要求。虽然议会现今只有半数进行了普通选举，但是其后每年7月，在回归日进行游行成为惯例，而游行中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主题。近年则更加活跃，兴起了反对市街改造、埠头转移或者撤去古树的市民运动。

与自我认同的摸索、脱边境化相重合的市民运动

最后，简单叙述一下与自我认同的摸索、脱边境化相重合的市民运动。一个是台湾的市民运动与“台湾人”自我认同的确立、脱“边境”化的连动，另一个是香港的市民运动与“集体性记忆”的维护，即居民守护自己以往的体验、维持自我认同的动向。

今后，这两个地区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的走向将会如何呢？当然，民主化如何深化至关重要，但是，与之相关的更加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构筑与母国的关系，这一关系将如何发生变化。更进一步，我认为，随着此前所置身的国家体系本身发生变化，市民社会的形成的走向也会流动地发生变化。

表1 台湾・香港居民の自我认同结构

(注)

①台湾の提问例：你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认为两者都是呢？

②“其他”中包括不知道、很难、没反应。

(出处) 根据以林泉忠为研究代表、在政治大学(台湾)、香港大学的协力下，于2005年-2007年11月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对象为18岁以上的当地居民，所收集的有效标本为每地区1000多。

台湾・香港住民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構造 (%)						
回 答	台 湾			香 港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神職人 (台湾人/香港人/マカオ人)	56.0%	68.1%	53.0%	15.5%	13.3%	21.2%
日本人 (中国人)	7.0%	4.8%	3.1%	28.1%	33.0%	21.7%
神職人で日本人 (台湾人/香港人/マカオ人で中国人)	34.3%	33.4%	40.0%	55.9%	53.0%	56.3%
その他	2.8%	1.6%	3.8%	0.4%	0.8%	0.7%

(注) ①台湾の質問例：ご自身のことを台湾人だと思いますか、それとも中国人だと思いますか？または両方とも思いませんか？②「その他」は、分からない、難しい、無反応を含む。
(出所) 政治大学、政治大学(台湾)、香港大学の研究チームは、2005年～2007年の11月に4地域で行った調査の結果に基づく。対象は18歳以上の現地住民。集めた有効サンプルは地域別に1000名。

表2 围绕“独立”的是非，台湾、香港居民意识的比较

(注)

①台湾の提问例：如果中国政府承认由台湾居民自由决定台湾的将来时，你认为台湾应该独立吗？

②调查中也设问说：“如果中国政府不承认时呢？”

③“其他”中包括不知道、很难、没反应。台湾的调查中，也包括“现状维持”。

(出处) 根据以林泉忠为研究代表、在政治大学(台湾)、香港大学的协力下，于2005年-2007年11月所进行的调查的结果。对象为18岁以上的现地居民，所收集的有效标本为每地区1000多。

「独立」の是非をめぐる台湾・香港住民意識の比較 (%)						
回 答	台 湾			香 港		
	2005/	2006/	2007	2005/	2006/	2007
独立すべき	59.3%	64.7%	55.4%	22.0%	25.3%	25.0%
独立すべきではない	18.9%	16.9%	17.4%	68.3%	69.0%	64.7%
地元住民が決めるべき	3.1%	3.8%	4.6%	3.9%	1.2%	4.6%
その他	20.9%	17.3%	22.6%	5.8%	4.4%	5.7%

(注) ①台湾の質問例：もし中国政府が台湾住民に台湾の将来を自由に決めることを認めた場合に、台湾は独立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か？
②調査には、「もし中国政府が認めなかった場合」のような質問も設けている。
③「その他」は、分からない、難しい、無反応を含む。台湾の調査は、「現状維持」も含む。
④台湾の調査では、「独立すべき」は「台湾は元々独立した国」という意見を含む。
(出所) 政治大学、政治大学(台湾)、香港大学の研究チームは、2005年～2007年の11月に4地域で行った調査の結果に基づく。対象は18歳以上の現地住民。集めた有効サンプルは地域別に1000名。

参考文献

- 1、《现代亚洲研究 第2卷：市民社会》(亚洲政经学会监修、竹中千春等编、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担当部分：台湾的自我认同政治的特征：创造、想象、记忆交错的“近代性”(287-316页)。
- 2、《什么是‘香港人’：从战后的‘香港共同体’的成立来看新生自我认识的性格》《现代中国》第74号，2000年9月，98-106页。

摘要

第36回 SGRA 论坛 in 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 21 世纪的课题”

台湾、香港的市民社会与 21 世纪的课题

被“国家”所愚弄的“边境东亚”的“市民”——脱殖民地化、脱“边境”化的纠葛与自我认同的探索
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琉球大学准教授、SGRA 研究员 林泉忠

0. 本次报告的要点

1. 在殖民地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否可能？
2. 殖民地时代的台湾、香港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有着怎样的特征？
3. 置于特别的“国家”体系下的“祖国复归”后的台湾、香港是如何直面脱殖民地化的困难的？
4. 在这样的环境下，市民运动与民主化要求和自身的自我认同的摸索是如何连动的？

I. “市民社会”与殖民地

1. “市民社会”实现的要件：自由的社会环境和作为“市民”的自觉与参加
2. 在殖民地市民社会形成的可能性
3. 殖民地的市民运动的特征：浓厚的反殖民支配体制的特征

II. 在殖民地台湾“市民社会”形成的开始：1920 年代的社会运动

1. 背景：从强硬抵抗的时代到柔性抵抗时代
2. 性格：文化的、政治的自觉的开始
3. 主角：诸文化组织、政治团体：台湾文化协会（1921 年）、台湾民众党（1927 年）等
4. 内容：文化的存在方式的议论、差别的取消、政治性参加的要求（“台湾议会”的设立）
5. 特征：①与殖民地支配体制的合作关系与矛盾
②与母国不联动
③在很多的民间组织和刊物的名称里附有“台湾”⇒自我认同的萌芽
6. 挫折：因向战时体制突进、“皇民化运动”的开展而结束

III. 在殖民地香港“市民社会”形成的开始：1967 年暴动后的展开

1. 背景：①67 年暴动后的殖民地体制的缓和
②1980 年初期复归问题浮出水面
2. 性格：“香港是我家”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联动
3. 主角：诸压力团体、政党：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汇点、民主同盟（民主党前身）
4. 内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殖民地市民的福祉、地位的提高，中文的公用语化运动等
5. 特征：①与殖民地支配体制的微妙关系
②未必与“祖国”联动
③对于“香港人”自我认同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

IV. 复归后的特别的国家体系与脱殖民地化的困难

1. 结束殖民地的形态：特殊的“祖国复归”（台湾：“光复”（1945 年）、香港：“回归”（1997 年））
2. 复归后的特别的“国家体制”
台湾：①战后初期与母国一体化与纠葛（1945—49）
②“亡命迁占者国家”（1949 年—）
香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
3. 脱殖民地化的困难：脱殖民地化的前提：不平等的旧支配体制的解体与自身成为主人公的新体制的确立
①台湾：转变为以外省人为主体的独裁体制
②香港：旧支配机构得到维持



复归后的台湾政府和香港政府不提及“脱殖民地”，只提“爱国”

V. 民主化时代的台湾的市民运动

1. 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要求运动
2. 受压抑的弱势团体的结成与奋起：女工、原住民、客家、同性恋者
3. 市民运动的扩大：“社区”意识的形成、包括政治性参加、市政、环境、语言在内的议题的多样化

VI. 后回归期的香港的市民运动

1. 政治性参加要求的高涨：“23 条”立法的阻止、普选的要求
2. “七·一”游行的惯例化与议题的多样化
3. 市民运动的活跃：对市街改造的异议、反对埠头转移、反对移走古木

VII. 与自我认同的摸索、脱边境化相重合的市民运动

1. 台湾的市民运动与“台湾人”自我认同的确立、脱“边境”化
2. 香港的市民运动与“集体性记忆”的维持

【相关文献】

1. 《现代亚洲研究 第 2 卷：市民社会》（亚洲政经学会监修、竹中千春等编、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8 年）担当部分：台湾的自我认同政治的特征：创造、想象、记忆交错的“近代性”（287—316 页）。
2. 《什么是‘香港人’：从战后的‘香港共同体’的成立来看新生自我认识的性格》《现代中国》第 74 号，2000 年 9 月，98—106 页。



越南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变化的越南、变化的 “市民社会”的姿态

Vu Thi Minh Chi (越南社会科学院人间科学研究所研究员、SGRA会员)

“市民社会”概念的变化

“市民社会”在越南是个很敏感的主题。在15年前是被禁止的词语，也是为大家所回避的主题。然而，虽然是非正式的，现在作为概念在学术界内部经常被讨论。比如，最近有报道称“市民社会并不可怕”。当然，这不是刊登在一般的报纸上，而仅仅登在电子报纸上。其讨论的内容是“市民社会在越南是否存在”。我将在考虑到这种状况的基础上来开始我的报告。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解释发生了变化。其分水岭是在“刷新政策”（即革新政策）开始的1986年前后。在“刷新政策”之前，政治、经济生活是国家主导型的，在思想面上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但是，由于“刷新政策”是开放性的政策，其影响也是各种各样，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上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是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但是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发展了，由此诞生了富裕市民阶层和中间阶层。在这种状况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也开始为人们所研究。比如，1990年代开始了“人民的诸组织”的研究，2000年代“越南的国民组织”这一主题也在与外国学者一起合作研究起来。2004-2005年，在越南实施了评价市民社会的CSI项目。其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解释也发生了变化。

各种各样的“市民社会”的解释

政府中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是并不一致。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参加型的市民社会对于与贪污的斗争有利，而持否定态度的则认为市民社会恐怕会被利用起来对抗政府。还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大众组织必须由政府来规定。由于不是出现在正式文件中的词语，所以对于市民社会能很好理解的人很少，而这种讨论也是非正式的。

从外国的视角来看，比如，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在越南存在着成为市民社会的潜在性的组织，但是市民社会并不存在。学术界受外国的影响，作出反映越南特殊情况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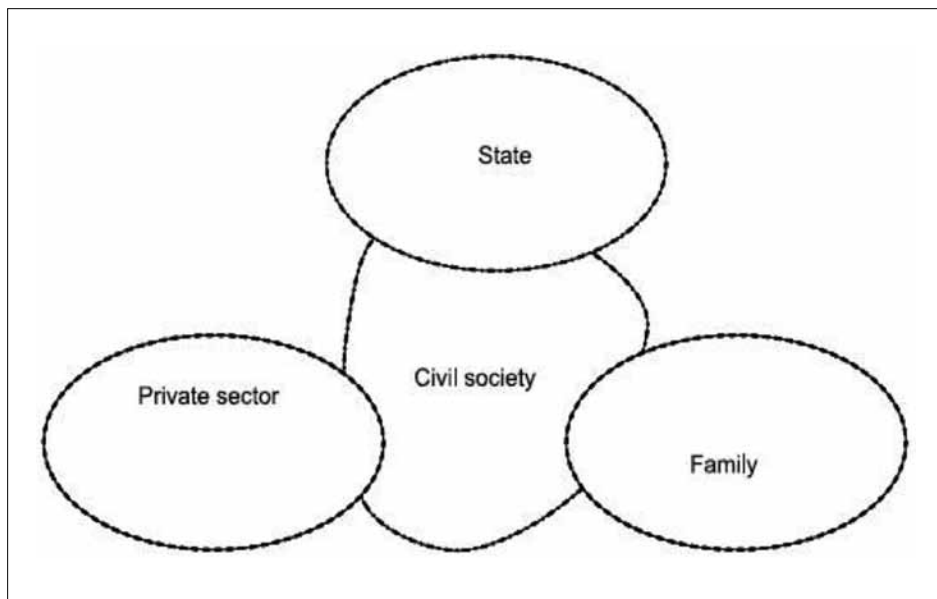


图1 存在于国家与市场与家庭之间的讨论广场（CIVICUS CSI — SAT项目）

市民社会的定义，比如说是“存在于国家与市场与家庭之间的讨论广场”。（图1）这是非常开放式的定义，意思是大家聚集起来，向着共同的目标，为了自己的生活更美好而进行协商的场所，位于国家与企业与家庭之间。但是越南的特殊性在于国家与市场与家庭之间的界限很暧昧，不甚清晰。有很多重合的部分。没有与国家的对抗性。

也有人认为若这些组织是市民社会组织的话，那么在越南以前也存在。在封建主义时代、殖民地时代的社会里，比如像近邻居民组织、同业者联合等，存在着为了相互的利益人们齐心协力的自发性的组织。

但是，战争中，所有的大众组织都被祖国战线所吸纳，成为政治目的优先的大众组织。从战争结束到1986年为止，只存在位于战争的延长线上优先政治目的的大众组织，但是“刷新政策”之后，出现了诸如NPO、NGO、职业团体、非正式组织等很多新的组织。

市民社会评价（Civil Society Index : CSI）

市民社会的构造

CIVICUS是1993年成立的培养和保护市民社会的国际组织。现在，以包括越南在内的50多个国家为对象，开展了以一定的指标来进行评价的项目，越南方面负责的是越南开发问题研究所（VIDS）。这里也使用了这个项目的很多数据。评价市民社会的指标（CIS）包括四点，即市民社会的构造、市民社会的环境、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市民社会对一般社会的影响。

评价的结果反映在图2上。理想的市民社会是钻石形状的，但是，越南的钻石很小。结构为1.6，环境为1.4，评价最高的价值观则为1.7。但是，在怎样综合性地影响到社会这一点上有其局限，只有1.2。另外，中国（图3）虽然结构为1，环境为1.2，但是价值观非常高，为1.8，综合性的影响也比越南高很多，为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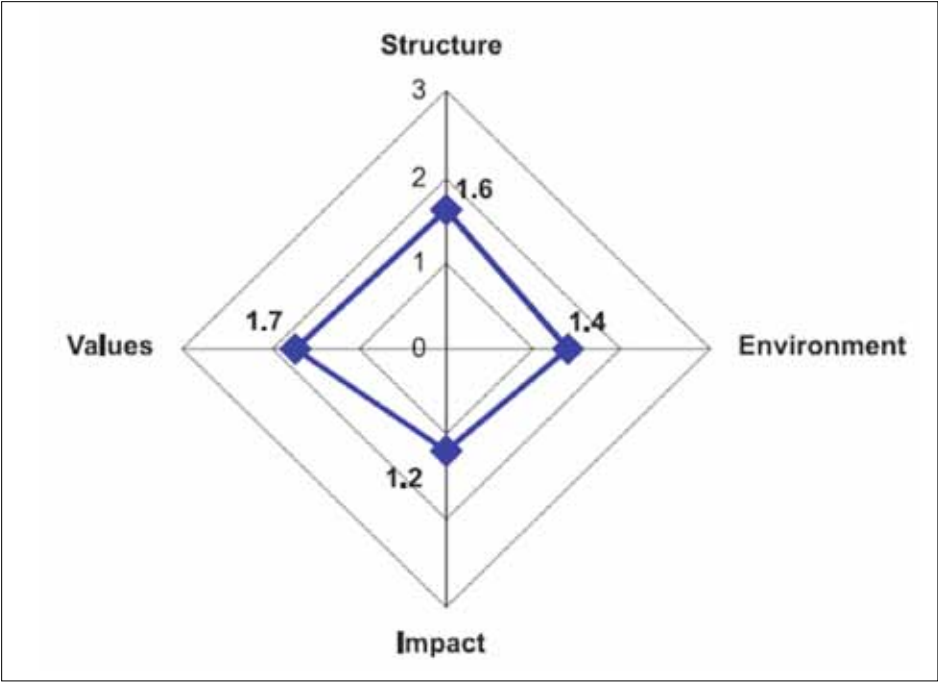


图2 经CSI分析的越南市民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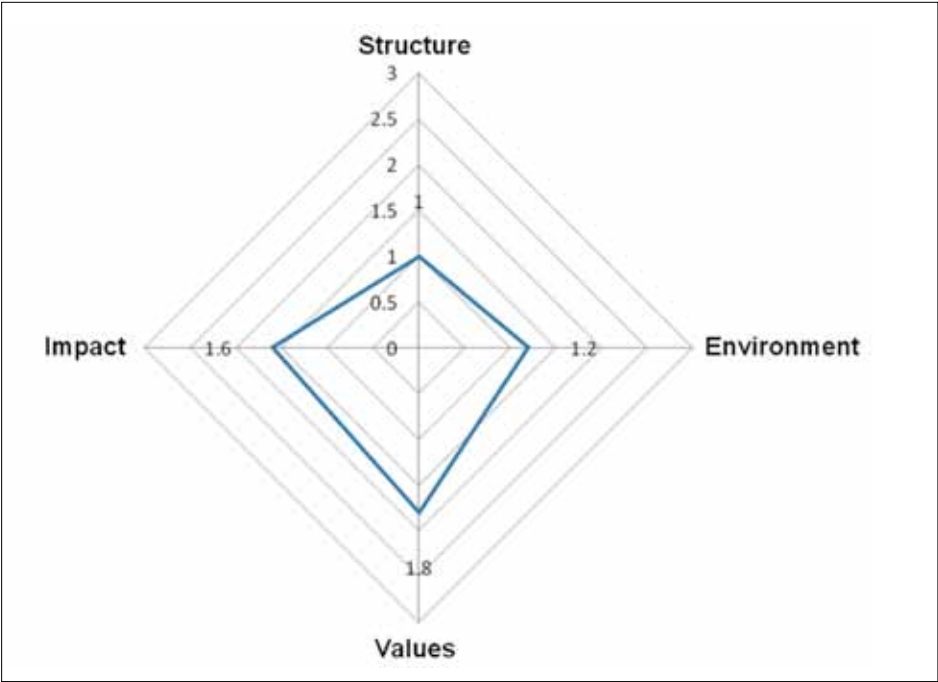


图3 经CSI分析的中国市民社会
(NGO Research Center, SPPM, Tsinghua University, 2006)

下面就评价指标的四个方面来进行说明。首先，“市民社会的构造”由大众组织、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共同体内的组织这四类组织构成。大众组织（Mass Organization）里有祖国战线、妇人联合会、农民会、青年团体、旧军人团体、综合劳动工会。大众组织的特征是从上述的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存在，与党有着特别的关系。在全国有着广泛的网络，越南人口为8000万，而其成员有3200

万。“职业组织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and Umbrella Organization)”是由红十字会、科学技术联合会、文学艺术联合会、合作社联盟等保护组织,以及比如窗帘制作会等专业的业界团体所构成。成员也是遍布全国。其特征是与大众组织相比间接地与国家有着关系。第三是“非政府组织 (NGO)”。在越南是种形式上的组织。在国际支援机关、国际 NGO 解决随着市场经济的导入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时,作为其窗口而设立起来。所以也有虽然有事务所但是没有成员的情况。规模很小,但是全国的组织有 2000 个左右。在 1990-2005 年的短短 15 年间,急速增长,成为支撑起越南市民社会的一支力量。在越南,国际 NGO 不是市民社会的主体。最后是“共同体内的组织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全国有 15-20 万。虽然开展草根层次的活动,但是没有独立的法律框架,作为非正式组织开展文化、信用、农业、近邻等活动。在民法上可以登记为大众组织,但是很多并未登记。

越南市民社会在结构上很强,这一数量上的发展受到正面评价。也就是说,特别大,人口的 74% 至少从属于一个组织。但是,也有弱点。由于各个组织之间没有联系,所以统一的网络很脆弱。而活动的领域也不均衡,集中于慈善活动,不怎么参加政治性活动。据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 的数据,参加政治活动的仅为 2%。

市民社会的构造很强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目了然。比如,人口是 8000

越南、中国、新加坡的组织成员

※ 组织	越南	中国	新加坡
※ 开发・人权	1, 5	0, 4	0, 5
※ 保存・环境	7, 6	1, 2	0, 9
※ 和平	9, 2	0, 9	0, 9
※ 宗教	10, 4	3, 6	19, 8
※ 工会	11, 3	6, 9	4, 3
※ 职业	13, 3	1, 2	4, 4
※ 医疗卫生	14, 8	2, 7	3, 6
※ 青年	15, 4	1, 1	8, 3
※ 教育・艺术・音乐	17, 3	2, 2	14, 0
※ 体育	19, 2	3, 2	15, 1
※ 共同体	26, 2	1, 5	2, 4
※ 社会福祉	26, 5	2, 9	7, 1
※ 妇女	28, 4	0, 9	1, 2
※ 政治	28, 5	8, 3	0, 4
※ 其他	3, 7	—	3, 6
※ 个人所属组织的平均数	2, 33	0, 39	0, 86

※ 数字为调查对象人数的比例 (WVS)

(图4 越南、中国、新加坡的组织成员)

万，而参加组织的人为6000万。人均所属组织数为2.33，与新加坡和中国相比，高达3—5倍。

具体而言，比如，参加开发、人权组织的比例，越南是1.5，而中国是0.4，新加坡是0.5。这一数字也是WVS（世界价值观调查）这一项目的数据。（图4）

市民社会的环境

下面来谈谈第二个指标“市民社会的环境”。首先，政治环境上，政治的自由、媒体的自由、国民的基本的人权是如何得到保障的呢？政治的自由，典型的是选举，但是选举的自由是十分形式的，有着作为一党体系的局限。媒体的自由也是虽然越南人评价很高，而外国的评价，比如Freedom house的评价正相反，认为在越南没有媒体的自由。基本的人权是为宪法所保障的，但是有很多违反的情况。接着是经济和社会环境，识字率很高，社会很安定。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政府部门的贪污很严重。

法制环境上，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法令。第一，1998年的草根民主主义法令（Grassroots Democracy Decree）。其主要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公益事业，“国民有知情、商谈、实现、监视”的权利。然而，回顾10年间的实绩，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比如，在村级会议上，村长即便阐述计划，村民们听是听着，可是反映不积极。因为他们认为即便陈述了意见上面也不会听进去的。另一个法是2000年的新企业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前在越南要创设公司是很难的一件事，几乎办不成，但是自从新企业法实施后，民年企业与业界团体急剧增加。在业界团体里分为两种，一种是跨越部门在地区层次上活动着的，一种是特定业界的企业聚集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是2003年的结社法令（Decree88: Regulation on the Organizatio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ssociations）。但是，虽然本应该在2006年在国会上通过的，但是，结果未达成结论而束之高阁，看来要实现法制化还需数年。因此，实际上结社非常复杂和困难，需要时间，也需要关系和金钱。而且，结成后在税务上也不受优待。也就是说没有奖励条件。

总而言之，越南的市民社会的弱点是政治的自由上有局限，法制环境上很严峻。而且，因为贫困率很高，所以还没有参与市民社会活动的从容。

市民社会的价值观

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包括民主主义、透明性、宽容、非暴力、男女平等、贫困的减少、环境持续、信赖与法支配的尊重等。越南的市民社会的强项是平等、贫困的减少、或是参加志愿者活动，这些作为民众的课题维持着。然而，也有未被促进的价值。那就是透明性。而且，比起一般社会而言虽然少很多，但是贪污还存在。民主性里也有局限。越南有民主主义，但是那被称为是在由国家决定的框架中的“集中的民主”。比如，即便举行民主选举，当选者也需要上级的认可（也有的是事先认可）。更进一步，环境保护中也存在局限。价值观虽然在四个指标中是评价最高的，但是其实践与促进并不值得骄傲。

对一般社会的影响

第四个指标“对一般社会的影响”是评价最低的。比如，对于人权问题，市民社会几乎没有能够影响到。对于社会政策和国家的说明责任的影响也很弱，对于民间部门的影响接近于零。

小结

如上所述，因为越南的市民社会有着传统的基础，所以“刷新政策”以后，有了量上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贫困对策和权限转让方面所需能力的提高有所贡献。

然而，局限很多。预算不足，法制上很严格，独立性很弱，认识不一致，没有连带性，活动领域不均衡。

有人认为 21 世纪将出现世界范围国家体系不景气的状况。因为在发达国家对于福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对于贫富差距，国民抱有不满意。而且，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出现了诸如地球协作革命、非国家的协作活动等新的潮流。唤起了全球化市民社会与亚洲的市民社会这一新的问题设定。在这样的状况中，越南的课题在于如何与新潮流并轨。

我认为有五个课题。第一，是必须改善薄弱的社会、法律、经济环境。第二，必须改善社会组织的内部构造，强化说明责任和透明性。第三，必须强化网络的构建，比如说增加越南的 NGO 成员。第四，必须改善与民间部门的合作关系。最后一点是理解、赞许市民社会，也需要有研究能力。



中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摸索中的 “中国式市民社会”

刘 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刚才我饶有兴味地听了第1部分和第2部分各位专家的讨论，特别是关于越南的描述，我觉得与中国有重合的部分，但同时我也认为中国确有其独特的一面。

本人在这个领域完全是门外汉，我的专业是历史。最近经常思考如何将现今的中国在历史中进行定位的问题。中国今年将迎来建国60周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过去了30年。在将现在置于历史长河中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看待建国以来的60年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年度。但是，比如说50年之后、100年之后的人们来评价历史时，中国改变路线的1978年，视情况而言是不是比1949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呢？历史会不会如此进行评价呢？我认为，在看重历史的内容而非形式时，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较之以前的变化要来得大。

“1949年”的意义与课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的国家，这是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确立了高度整合的政治、社会体制，中国构筑起特有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体制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同时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新国家下，一方面确立了“人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也彻底实行了对“权力”的服从与通过权力实行的统一管制。这一点成为1949年以后的重要课题。

此外，虽然实现了平等，但是国民生活的改善并不显著，传统的“人治”体制根深蒂固，也成为市民社会形成的巨大障碍，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而且，民族整合和社会安定的问题，以及与台湾的分裂局面也成为重要的课题。在考虑市民社会的问题时，有必要重新探讨1949年的意义。

“1978 年”的意义与课题

若将 1978 年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归纳为几点的话，首先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与社会体制的巨大变化相关，经过 30 年，大体实现了国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还有，政治权力的“地方化”与“社区化”的推进也是巨大的变化。实现了村民自治，居民社区的民主化得到了扩大。

其次，现在一般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但是，出现了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即规制弱化的现象。人们的社会性流动变得活跃起来，此前非常单纯化了的社会构成阶层，在 1990 年代以后急速分化，其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阶层，作为一种对于国家控制的“对抗势力”而急速形成。

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化的急速推进。在最近的中国，称 1980 年代出生的人为“80 后”，1990 年代出生的人为“90 后”，但是，实际上每十年价值观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所容易出现的思想上的统一与价值观的统一，在中国已经不再适用。在我看来，现在的留学生，80 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中，不少人怎么看都不像是中国的年轻人，对面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深有感触。

另外一点就是摆脱“臣民”意识以及公民意识的形成。“臣民”这一概念是指“从属”或者“服从”，中国的传统的臣民思想贯穿了毛泽东时代并持续到革命之后。这也是造成文化大革命悲剧的最大的理由，可是，摆脱臣民意识已经成为一种价值观在人们中间形成起来。当然，虽然还没有到达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在中国人们已经认识到国民不是臣民。

“公民社会元年”

说到“市民社会”，在中国一般使用“公民”这一概念。本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2 章“中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中就使用了公民的概念，而这时是国民的意思。但是，中国常常使用“公民社会”这一词语。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的解释，政治、社会概念的“公民”作为一般概念来使用，而“市民”则多用于与经济活动相关联的时候。我是门外汉，不知道这样解释是否妥当，但是我想中国的公民意识确实产生了并正在逐步扎根下来。

有人认为 2008 年是中国形成公民社会的所谓的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其根据是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围绕着举办奥运会，各种人群以各种方式行动起来，其中，志愿者所参加的各种 NGO 组织的活动非常突出。还有，四川大地震以后，多数的 NGO 组织加入到救援活动中，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也成为称为“公民社会元年”的理由。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公布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而清华大学也对应地出版了《中国民间组织 30 年——走向公民社会》。这两本书有很多的相通之处，但是大致说来，北京大学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的时代”，而清华大学与之相反，认为还远远没有。清华大学这样认为的最大的理由在于，宪法所保障的结社的自由在事实上和制度上还未得到保障。根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公布的数字说所谓的民间组织大约有 40 万，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

统计则认为有200万到270万之多。无论如何，公民社会形成、或者说正在形成的理由是从“单位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换。以往，中国的社会组织全部由“单位”这一概念来说明，无论是公司，还是学校，或是村落，都作为一个“单位”被统括起来，但是现今这样的单位社会崩溃了，在向公民社会转换。

无论是NGO还是NPO，都不计其数，而“个人”的领域也有所扩大。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进入到完全依据个人价值观而行动的时代。几个星期之前，我看到NHK的专题节目，讲述的是如何与中国的80后打交道的问题，日本人将与不同于传统中国人的80后如何打交道一事作为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而提上日程。

公民社会形成的课题

在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可以认为较之1949年的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变化与更为本质的社会性变化相关。但是，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还必须克服各种问题。

一个是臣民意识。虽然变化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臣民意识在国民中间还根深蒂固。国民中间对于贤明的领导人的期待感非常高。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想法。还有，农村与城市的户口问题成为形成公民社会的巨大障碍。另外，这是多民族国家的烦恼，即民族问题。如果不能克服这一点，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关于最近的情况，我想补充两点内容。第一，历史的阴影。我认为，如果不克服历史的影响的话，公民意识的形成，这一关系到公民社会能否扎根的根本性问题会十分困难。

现在，在中国，《中国不高兴》一书十分畅销。这本书本宣扬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有很多的读者，据说发行量达到60万或80万。

这本书所强调的是，在已经成为大国的中国今后应该努力表达自己的主张。还有，作为大国必须管理世界。其论调是，中国作为国内问题必须实现人权，但是对外必须追求族权（民族的权利）。也就是说，必须同时追求人权和族权这对内与对外的两个目标。

从所谓的地球市民的概念来考虑，应该如何评价这一主张呢？中国现在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会，我认为可以称为内向的公民社会。这里所强烈追求的是人权的问题。虽然人权是中国每一个国民所追求而来的，但是，当人权与族权发生冲突时，或者两者同时出现必须选取何者时，这本书中强调的是族权。这里所说的民族是所谓的中华民族，即包含中国所有民族的民族权利。就这样将人权与族权对立起来看待的视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观察近代史的历史观中。

不过，附带一句，虽然这本书很畅销，但是在知识人、研究者、或者政府中根本不受好评。该书的销售未遭禁止而畅销达几十万部，这一现象本身就象征着中国的变化，而其畅销的原因在于年轻的80后群体的力量。可以推测认为或许读者的多数就是他们。

最后想附带说明的是外部要因，也就是国际环境。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对于中

国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与日本是不断给中国带来影响的要素。由于时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就省略不讲了。

“知识界”的公民社会的构筑

说到如何在中国建立起公民意识，中国的“知识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以前就指出应该关注在中国发挥着特有作用的“知识界”的存在。也就是说可以将“知识界”定位于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势力。比如说，“知识界”对于《中国不高兴》基本上是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的。“知识界”所追求的是如何培养公民意识这一方法论的问题。

从历史的领域来说，在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中间，有主张认为，义和团运动与其说是爱国主义运动，不如说是反映了偏颇的民族主义、违反近代文明的事件。也就是说，义和团运动是无视法律与国际法的一种排外运动。持这种主张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意识到培养公民意识的必要性。

我认为，在思考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现状时或许存在着三种方向性。

第一，政府当作目标的“地球国家”的方向性。就是在地球上如何与国际社会取得协调。

第二，姑且称之为民间，《中国不高兴》的论调所象征的一种动向，“族权国家”，即提高民族存在感的方向性。

第三，知识界所主张的以“地球市民”的形成为目标的方向性。

第二种的族权国家的看法也与政府当作目标的地球国家相反，所以，政府也对这本书十分警惕，认为是本有可能将中国引向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危险的书。对于在中国抬头的危险的民族主义，政府和知识界均抱有警戒心理，只是政府当作目标的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国家间的协调，而知识界则指向如何建立知的互动空间。

在中国，虽然对于形成公民社会在制度上还有各种障碍，但是，其意识正在以知识界为中心处于逐步形成之中。如何将以知识界为中心的这一势力渗透到国民、市民的层次呢？处于中间的知识界将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因各种利益关系发生激烈冲突之中取得平衡呢？这些都是在思考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未来时最重要的关键点。

摘要

第36回SAGA论坛 in 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中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

摸索中的“中国式市民社会”

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院教授 刘杰

建国以来60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在中国除了“人民”这一耳熟能详的概念以外，“公民”这一表述也频繁地开始使用起来。“公民”这一概念虽然也用于中国的宪法中，但是，在中国“公民意识”并未扎根。另一方面，在“公民意识”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政府”与“社会”的对立，促进了文化与价值的多元化。这一变化成为对国家安定的重大挑战。“中国式的市民社会”的障碍是什么呢？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我想在介绍近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些问题。

一 历史中的“1949年”与“1978年”

迎来建国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中国。如何将这30-60年的历史在“近代史”中定位呢？

1. “1949年”的意义与课题：

意义：

- 战乱与分裂局面的大体结束
- 高度整合体制的确立：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西方诸国、区别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
- 一方面确立“人民”的概念，另一方面贯彻对“权利”的服从与通过权利实施的统制
- 打破贫富分化与实现社会的公平

课题：

- 民族整合与社会安定的问题、与台湾分裂局面的存在
- 制度的整合与社会分裂的矛盾
- 被权力与意识形态愚弄的“人民”
- 国民生活的改善不明显
- 在与世界的关系上面临重大的困难
- 在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历史继承

⇒1949年前后的连续与非连续的问题：连续≥非连续

2. “1978年”的意义与课题：

意义：

-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大体实现国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 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和“社区化”（村民自治与居民社区的民主化的扩大）
- 对于“社会”的国家控制的弱化，社会流动的空间上、阶层上的扩大

- 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的开始
- 摆脱“臣民”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形成
- 政治制度的摆脱传统的变化：集体领导体制、媒体的作用、信息的普及

课题：

- 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不公平感的增加
- 环境破坏的严重化
- 政治组织与个人的腐败
- 犯罪的增加

⇒“1978年”以后：向中国历史的本题的回归（地方分权、礼治的传统、儒教的秩序观）与摆脱历史的侧面：价值观与文化的多元化、全球化。

1949年以后：基于一元化的历史的继承、权力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民”

1978年以后：基于多元化的历史的继承、“公民意识”的形成

→“1978年”是否是较之“1949年”更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呢？

二 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



四川地震后的民间组织与志愿者活动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编）：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中国距离公民社会仍路途遥远。理由：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

● 民政部的统计：中国的民间组织数约为40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推测：200万到270万

● 中国的公民社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吗？

- 1 独立于国家与政府：从单位社会走向公民社会
- 2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NGO组织与NPO组织
- 3 “个人”领域的出现：自由、独立的意志与自主性的确立（80后）
- 4 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决定权在个人

● 中国的公民社会未成熟

- 1 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的组织，很难说是纯粹意义上的NPO
- 2 募捐、纳税意识的欠缺
- 3 结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

● 中国的公民社会的障碍

- 1 臣民意识——对于贤明领导人的期待。服从或抵抗。爱国无罪。
- 2 城市与农村的户口制度——不平等所带来的公民意识的欠缺
- 3 多民族国家的两难处境——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障碍

三 “知识界”的公民社会的构筑

● 中国的知识界

处于“国家”与“社会”中间而具有影响力的“中间势力”

● 对于中国近代的基本认识：“革命史观”或“近代化史观” “历史学必须超越政党、民族、国家”

“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不是革命与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近代化的问题”

- 对“义和团事件”的重新评价：通过历史教育来养成“公民意识”

围绕袁伟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论争的本质

● 对于抬头的民族主义的批判

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

- 《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

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

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 《中国不高兴》（2009年）

中国必须拥有“大目标”

所谓“大目标”是指：①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除去霸道，帮助善良的人们）。②中国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关键词：1 “奴青”（⇔愤青）

2 抛却“文艺腔”（感性的、文学的、文艺的）（⇔行武腔）、尚武的精神

3 “持剑经商”

对于《中国不高兴》的批判

-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3个类型：

- 1 抵抗的民族主义 1840-1949年
- 2 文化的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以来的国学热、新儒学等
- 3 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 发展到对“中国认同”的追求。阿Q精神式的民族主义

《中国不高兴》是卑劣的、排他的民族主义

-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

欢迎多样的讨论

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变化为“主动进攻型的民族主义”

“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我看到了一种很可怕很危险的东西。它离以强凌弱的种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其实已经不远了。”

“这种理论思潮又会把一个刚从百年苦难中获得繁荣的机会的民族，重新引入苦难的深渊。”

- 《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8日

《中国不高兴》一书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正在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人群是那些心理还在脆弱期的未成年人，以及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为暴力行为，我们在“文革”中曾经有过痛苦的经历，被浪费和糟蹋的不仅是青春，还有国家精血。

● 普遍的“民主”还是中国式的“民主”

●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民族问题、“群体事件”，人权、贫富差距、腐败等制度方面要如何进行改革呢？

● 未知的“80后”

公开座谈讨论会

主 持：孙 军悦（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非常勤讲师、SGRA 研究员）

讨论者：宫岛 乔（法政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

都筑勉（信州大学经济学部教授）

高 熙卓（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SGRA 研究员）

中西 彻（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林 泉忠（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琉球大学准教授、SGRA 研究员）

Vu Thi Minh Chi（越南社会科学院人间科学研究所研究员、SGRA 研究员）

刘 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孙

今天的综合讨论有着十分豪华的阵容，我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宝贵的时间来听取各位富有刺激的讨论。首先就刚才的报告，如果报告人互相之间有什么感想或是问题的话，请谈一谈。

高

我饶有兴味地听取了各位老师的报告，非常感谢。今天的报告中，特别是中西教授关于菲律宾的部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西教授在报告中引用了韩国出身的Ha-Joon Chang先生的“不良撒马利亚人”的说法，讲述了菲律宾的穷人们摆脱贫困的尝试受国内外的双重阻隔装置而遭遇挫折的内容，我想这是教授25年来现场调查活动的实际体会。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本身对于中西教授的政治见解抱有同感，但是联想到韩国在1987年民主化运动之际，正好1986年菲律宾总统选举中发生的不公正问题引起广大人民行动起来阻止马科斯长期执政，此事件在韩国成为话题。而其力量与菲律宾内部的贫困层的问题是如何相关联的，这是我想提问的内容。在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中，知识人与学生自居为此前遭到排斥的人们的代言人，我想知道在菲律宾这种关系如何？我觉得在菲律宾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而其后又怎么样了呢？现在又是如何被理解的呢？我想听一听您的见解。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刘杰教授的报告。您的报告整理得非常清楚，中国的变化一目了然，非常感谢。其中我想问的是，您将“市民”定义为经济人、黑格尔、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与之相对的是在中国使用“公民”这一说法。在韩国与日本，我觉得公民的“公”是归结到“OYAKE”这一文脉的典型概念。在中国所使用的“公民”一词中，没有韩国和日本的这样的用法吗？其中有着“臣民”这一含义吗？我想听一听您的意见。

Chi

我想谈一下听了今天各位的报告的印象。我想“市民社会”可以解释为各种意思，而这一主题是在这20年间以一种被重新发现的形式而浮出水面的。在刚才的报告中谈到，也存在认为国家体系无法很好地进行下去，于是市民社会呈现发展势头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国家、市场与市民社会这三者并不对立，以一种灵活的形式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合作，瞄准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这样的形式是最好的。区分开来建立起互相对立的关系并不好。

林

我想这次论坛的一个目标是探索对于东亚而言市民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东亚的市民社会有着怎样的特征，这一点还未很好地整理出来。我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作为跨越国境与民族的世界性的普遍概念是否应该被接受这一问题本身尚有讨论的余地。在东亚的市民社会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各种各样的发展阶段，我感到有必要更加细致而且认真地观察其各自的状况与特征。

宫岛

我觉得林教授选取台湾与香港，将两者与市民社会的形成联系起来考虑是非常特别的看法。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欧洲的直布罗陀地区。直布罗陀位于西班牙的南端，现在是英国领地，这儿的人们不愿意回到西班牙而在进行着抵抗。与香港有些相似。

拒绝对国家的无条件归属，以一种与所谓的应该归属的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

形式来创造价值。拿香港来说是自由与民主主义，台湾则稍微复杂些，但也存在这些问题。除去日本，或许是在亚洲中形成市民社会这一点上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我想今后要注意香港的变化。

都筑：在白天的时候，我还在想莫非民族主义者只有我一人，但是，听完所有的报告，我感到日本终归也还是亚洲，虽然所处的状况有些不同，但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也对林教授的报告的最后部分抱有很大的关心。这应该称作哪一种自我认同呢？民族认同，在日本是以外来词的表达形式通行的词语，但是有没有市民认同一词？我认为正因为如此香港与台湾所处的状况很困难。

我学习不够，没有拜读过林先生的著作。您认为香港与台湾是边境，但是我觉得不如说是中心。我觉得在日本，冲绳等地区是最为开明的地方，本土才是边境。即便存在这种地理上的中心意识也并非不可思议。

中西

菲律宾现在最为追求的是菲律宾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菲律宾的历史当然与香港、台湾不同，但是殖民地时代很长，而且受到过多个国家的支配，由多个语言集团构成，所以存在民族认同的问题，人们经常议论这实际上给市民社会的形成带来很大的问题。

我对于市民社会的形成完全无知，所以联系到自己关心的主题进行了报告，但我必须回答高先生的提问。首先，我觉得将菲律宾的“二次革命”视为民主化有所牵强。确实画面中展现出来的是穷人们乘上吉普车去Edsa、Makati的场景，但是改革的烽火开始燃起的是军队的基地以及象征富裕层的商业街Makati（现在），拉莫斯所代言的则是美国的意志。而被暗杀的阿基诺夫人的本家称为Cojuangco家族，是典型的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作为地主，Cojuangco家族与夫家的阿基诺家族几乎占遍了Tarlac州的所有土地。所以，在菲律宾，直至现在寡头们掌握政治的事实完全没有改变。

不如说，马科斯是从Ilocos Region的村会议员起步的一位地方政治家的儿子。所以记得当时总是把他跟田中角荣一起做比较。我觉得后来媒体对他的态度稍微让人有些可怜。马科斯所进行的关于大米的农地改革，据说是历代总统中最为有效的。说到为什么地主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是因为西班牙系的地主所执掌的甘蔗和椰子的大农园的农地改革完全没有推进。我是把这些话题置于脑际来描述双重的“踢开梯子”的。

还有一点，我并不清楚菲律宾的CSI指标，但是越南的市民社会的构造以及价值观的评价非常高的秘密在哪里呢？因为越南是幸福度也非常高的国家。我想当然也存在其它的政治条件，但就此恳请指教一下。

刘

宫岛教授在最后指出了亚洲的市民社会面临的几个课题，由于在亚洲有历史要素、文化要素、宗教要素等各种要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所以有种印象就是认为市民社会的形成与EU相比并非能够那样简单地形成。在亚洲，国家单位或者地区单位的构成从根本上与欧洲不同，而且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差异，所以市民社会互相之间的理解并没有什么进展，这是现状。

您也指出，战后的欧洲站在反省战争的立场上推进了市民社会间的协作，而虽然亚洲也同样站在了反省战争的立场上，但由于抱有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所以无

法简单地顺利进行。在亚洲，当然那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无法忽视的是文化要素。比如，我觉得包括对于政治制度的理解、臣民思想的残存在内，超越政治的、历史的要素，文化要素对于亚洲市民社会的形成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孙

非常感谢。下面，我来念几个台下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市民必须怎样‘富裕’？怎样‘富裕’才能成为市民？”。确实在以往的市民社会论中，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被认为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今天中西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富有刺激性的问题，即贫困层能否成为市民？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是不是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形成。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向宫岛教授的提问。“中文里市民意味着居住在城市里的人，英语里也一样吗？农民也是市民社会的一员吗？还有，市民与国民之间的本质性区别是什么？”另一个问题是“若不改变世界经济的地区贫富差距的话，是不是像EU一样的一个地区的市民社会无法成立呢？”。

中西

在菲律宾的市民社会论里，最近出现了“新中间层”抬头的议论。确实在绝对数量上增加了，但是，与之相对等，社会底层也同时有所增加，所以比率上是否增加是个疑问。如果单纯地运用哈贝马斯的定义的话，我想在富裕的基础上，以自立于政府的形式能够要求多少程度的权力获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在谈“富裕”的时候，我最近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当然，人没有食物无法生存，所以某种程度的收入是必需的，那时若想以某种形式采取集体行动的话，无论如何社会网络都是必需的。关于以何种形式担保这样的网络，我想其实社会底层的人们是有着相当的智慧的。只是，说到为什么不能具体实现，这还是存在制度上的问题。还有，如果我们再多加一点关注的话将会如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

宫岛

很抱歉有些像在大学上课，还请耐着性子听一下。把“市民”一词称为citizen、法语里叫做citoyen时，多是指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但是并不是“城市的居民”的意思。这是古希腊、罗马以来以civitas的概念来讲的，用于指拥有其国家的正规资格的成员的意思，这是市民(citizen)的原意。所以，其定义是“政治共同体的正规成员”。

被赋予一定资格的古希腊的雅典、忒拜、罗马的市民们拥有获得市民权与选择政治领导人的权利。所以，是被赋予权利并行使它的意思，不同于单纯是国王的臣民。重要的是被赋予正规的资格并行使它，对政治共同体的公(OYAKE)的事情进行发言。如果农民也被赋予政治共同体的正规的资格的话，就成为市民。拥有国籍就拥有市民资格是在近代国家成立之后。在近代国家成立之前，比如让·雅克·卢梭并不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国民或瑞士国民，而说是“日内瓦的市民”。这也是在近代国籍法成立前夜的事情。

关于世界经济的地区贫富差距的问题，当然，并不是说改变经济的贫富差距只在EU内部进行就可以。必须考虑将世界经济纳入视野之中，谋求在其中怎样改变贫富差距。但是，现在不存在世界政府。要在世界经济中改变贫富差距该如何行动，现实情况是出现了被称为Bad Samaritan的世界银行等。最大的问题是将世界

纳入视野之中，积极筹划并推进改变贫富差距的机构还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各个地区或者地区化了的国际机构的范围内，无论如何都行动起来或许是目前可行的方法。亚洲很困难，这一点正如刚才的发言里所提到的那样。

孙 谢谢。贸然提问，还望原谅。我也想就这个问题听一听刘教授的意见。刘教授您认为中国的农民有可能成为市民社会的一员吗？还有，关于市民与国民的本质性差异是什么？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在热议市民社会论时，民族主义问题也很让人在意。我觉得有人将市民与国民混为一谈。

刘 日语中，虽然语源均为citizen，但是既标记为“市民”，也标记为“公民”。确实，中文里的“市民”也时用于字面的意思，即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但是，一般说到“市民社会”，我的理解是作为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来使用的。

正如宫岛教授所说明的那样，拥有中国国籍的人们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中国的公民。当然农民也是公民的一员，但是农民不是市民。正如在中国存在着城市与农村的户籍制度一样，城市与农村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分界线。正如“市”这个字一出现就是说城市一样，这作为文字上的意思已经固定下来了。

因为市场经济也带“市”一字，所以人们会马上联想到经济活动。刚才我所介绍到的社会科学学院的老师，在说到市民与公民的差别时，他说市民是在主要意识到经济活动时使用。我认为这是从汉字所带有的印象来进行的说明。

孙 在我的印象中，在中国没有“国民”这个说法。而说“中国公民”。

刘 国民是没有，但是自古以来使用“国人”这个词。虽然国人并非正式的用语，在表示同样是中国人的时候，使用“国人”。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使用“人民”的概念。由于人民包含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所以在最新的宪法中使用“公民”这个概念。

孙 下面是向都筑教授的提问。“您认为日本的市民社会正在逐步变为市民政治，与欧洲各国相比，为什么它落后了呢？”

都筑 我觉得市民社会是状态的概念，没有推动或相互作用的意思。从历史上来看也有着非政治性的侧面，是通过强调艺术、经济等职业领域的自立性而形成的，无论好坏都是与政治相背的。

与宫岛教授的话相关联，在西方，从希腊到卢梭前后为止，political系统的词语与civil系统的词语意思相同。在政治本身与公共性事情相关这一意思上，一直到洛克、卢梭为止，但是正如马克思在犹太人问题上所批判的那样，恐怕与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市场经济成立的同时，政治性的部分与市民的部分，即所谓citoyen与bourgeois发生了分裂。重新将其统合起来应该是马克思的想象。我认为，从市民社会的论理来说，不如说非政治性存在才是自己人生的目的，是偶尔或者临时参与政治的印象。

若一直停留在那里的话，我想是不会积极地创建政府、进行更替、或者作为地球市民试图达成连带的，所以，从何处产生出那样能动性的政治性角色，特别是对

日本来说是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孙

这是对林教授的提问。“有着被殖民地的经历对于市民社会的形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影响？”

林

有着殖民地经历的社会首先直面的是殖民的统治体制。其特征是人们意识到外来的统治者，一系列市民运动就带有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性质。这是有着一般的殖民地经历的地区的市民社会形成的特征，但是我今天所报告的台湾、香港的案例是在殖民地支配结束之后的另一种新的经历。

那就是以祖国复归的形式来迎接新的时代。用我此前所讲的“边境”的概念来思考的话，确实还存在着在某种意义上最终中心并未改变的看法或者客观的侧面。本来，如果回到有着超主权意识的祖国的话，或者回到成熟的已经实现了市民社会的祖国的话，我想恐怕没有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冲绳的情况就与台湾、香港不同。

确实，香港与台湾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并非“边境”的侧面。如果考虑到近代经济的发展程度或者市民社会形成的成熟度有时比祖国还先进的话，未必是“边境”。但是，想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地区所认为的祖国在现在或者不远的未来是强调主权或者过于强调主权的祖国。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管香港、台湾在经济或市民社会形成方面是如何先进，我们都不应该忘记的是它们在政治意义上被视为边境的地区。这就是回归后的香港的情况。现实的情况是总想着如何与中心交往、如何共存或寻求新的国家体系，有着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烦恼。

孙

下面是向刘教授的提问。“我觉得迈向族权国家的可能性是个重要的问题。日本从大正民主主义一下子走向了军国主义化，而中国是BRICS的代表，很有可能今后会强化大国意识。一般认为日本的小国化与中国的大国化将是今后很大的课题。就此想听一听教授您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如果都筑教授方便的话，也请回答一下。

刘

“族权国家”这个词本身是刚才所说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中出现的概念。对内要求“人权”，但对外要求“族权”。近代史上，中国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使用了“国权”这一词语。国权本身是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所以这回出现了“族”这个概念。问题是如何考虑中国的大国化与民族主义的抬头，也就是是否与中国的霸权化相联系。

于是有可能联想到的是中华思想这个概念。实际上，“中华思想”这一概念，中国人几乎不知道，这个概念在外国，特别是在日本使用的很多。中国人不认为自己有着中华思想。但是从海外来看，在很长的历史中产生了这种中华思想。

中西

这样一来就有了中国的大国化与日本的小国化的问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在著作《中国的冲击》一书中指出，以漫长的时间区段来观察明朝以来的历史时，在亚洲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鸦片战争之后这个秩序一时间崩溃了，但是现在这个秩序要卷土重来。沟口教授预测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大的经济圈的时候，中国是否成为霸权国家另当别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还是会重新建构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自身在曾经是朝贡体系的时代也未必目标成为霸权国家，但是在海外，结果是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大国化让人联想到朝贡体系。我刚才强烈地意识到“知识界”而作此阐述的，在考虑中国大国化的方向性上，我认为必须更加重视这一知识界的动向。从结论上来说，我认为知识界会非常冷静地看待着中国的大国化。

都筑

即便不在霸权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层面谈论，当中国势力抬头之际，日本是否能拥有小国这一自我认同，而且曾经在中国作为国民国家抬头时，日本有过试图介入其中的历史，是否能够不重复历史，对于日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课题。

有观点认为虽然有过大正民主主义，但还是走向了军国主义。我倒是认为正因为有了大正民主主义才接着出现了昭和的军国主义，或者说以压制大正民主主义的形式在昭和时期日本国内出现了国家再次控制社会的事态。针对以上这种情况，以及中国抬头之际，没有资源的小日本将无计可施的观点，我不知道住在日本的人们在认识上有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今后的课题。

孙

今天，在高教授的报道中谈到参加民主主义的悖论，过于积极的市民的政治参与反而有招致某种政治性混乱的危险性。而且，市民社会的形成、成熟未必会带来民主化，比如，存在着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的研究，就这一点，我想听一听宫岛教授的看法。

宫岛

纳粹是以西欧民主主义的恶魔的形式诞生的，西欧的民主主义在19世纪就是霸权主义。落后的德国露骨地表现出随时扩张自己势力的意志，企图就是要挑衅法国。

法国在欧洲是大国，与英国一起率先完成了殖民地的瓜分。而德国从后面赶了上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缔结了倍感“屈辱”的凡尔赛条约。我想这里并非欧洲和平地展开了民主主义，而正是表现出先行者与后来者之间的卓绝的斗争。从其中诞生出纳粹的过程里虽然可以说是德国固有的问题，但是在纳粹占领法国时，其中也有人与之合作扮演了驱逐犹太人的角色。我觉得历史是不能简单地分割来看的。

在民主主义中，至少存在着目标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积极且普遍的要素，但是，也存在着并非如此的东西，用我们的话来表达的话，就是非常内向的、权威主义的东西。屡屡包含着暴力与支配他民族的危险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对于民族主义要好好地观察其两面。

高

最后出现了“参加民主主义的悖论”一词，这或许是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达方式。我想说的是，参加民主主义本身并没有招致政治混乱的意思。它归根结底是在韩国的历史语境中。我说在韩国被压制的B潮流在1987年以后开始迅猛出现，但是，在这潮流的根底里横亘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在韩国社会内部，作为一种对于争论焦点的介入方式容易变成政治中心及原理主义。而到处都存在这种介入方式时，从一般的生活世界的眼光来看，认为“政治是疲劳的东西”的背离政治的政治观、利害与价值观的直接冲突很容易发生，而且，以此为契机有可能让政治混乱增幅。市民社会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参加

民主主义是基本，但是，在现代韩国，追求的是参加的方法以及对话的技法。在这样的脉络中，如何看待韩国现在的悖论现象，我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表达方式的。

孙

下面一个问题也与参加民主主义相关联。这个问题是“网络社会对市民社会的形成是否有用”。还写着“特别是在中国”。在反日游行的时候，中国的因特网被视为反日的温床，首先想问一下刘教授。接着，关于在越南、菲律宾现在因特网的普及情况以及是否有网络言论，想听一下教授们的意见。

还有，在韩国也存在着网上的市民记者的现象，但是现在却走进了死胡同。在日本也存在着市民记者的现象走进死胡同的问题。就这个问题，请高教授、都筑教授来谈一谈。

刘

众所周知，在中国把通过因特网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称为“网民”。正如这个“网民”概念所象征的那样，那里形成了一个社会。可以认为是一个由多个阶层、包含了所有中国公民的、交叉纵横着的社会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因特网的普及对于市民社会的固定以及扩展明显地起着正面的作用，值得肯定。

但是，“网民”网络的扩大是否与健全的市民社会相关联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在“网民”的世界里存在着深深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当然不仅如此，也有冷静的民族主义，但是非常强烈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发言场所现在明显存在于因特网。这也是出于中国特色的情况。因特网有着对市民社会作出贡献的部分，反过来也有可能成为不太健全的排他性民族主义的温床。

中西

或许请别的教授来补充比较合适，我就自己所知道的范围来回答。贫困阶层也在大量使用网络。网吧提供着廉价的网络环境。所以，对此我持肯定的态度。但是，现状是也能看到大量负面的影响。一个是或许起因于在社会网络非常封闭的社会中，阶层间的流动性很缺乏。虽然能够开放，但是现状是没有这样的场所。另外一点是，事实上教育状况不太好。孩子们上网很多，出现了青少年卷入犯罪的情况，正在逐渐成为社会问题。

高

在韩国，“网络”与“市民”合在一起，“网络市民”这一词语固定下来了。2002年的蜡烛集会以及卢武铉政权依靠因特网的巨大力量而上台的事实也是众所周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因特网在市民社会的形成上确实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媒体。

但是，也还是存在着负面的部分。特别是韩国政治的对立或者原理主义的对立在因特网上流出，互相称为“敌人”的情况屡有发生。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窃听、排斥他者等大众社会问题。比如，还发生过某个名人由于对某一事件的发言而在网上遭到攻击，不得不退出电视节目的现象。

就市民记者一事，或许我自身的看法有些偏颇的地方，我认为不仅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接近方式，而且如果不更接近现实生活的话，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成为“没有市民的市民运动”是不得已的事情。作为巨大的实验，就为世界所熟知的“Ohmynews”而言也是如此。我认为其力量无法持续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Chi 说到在越南的市民社会中因特网所起的作用，虽然传统的报纸在力量上存在局限，但是，电子报纸的力量很大。在市民反对政府制定的计划时，因特网上马上就会纷纷发表意见。在报告中我也谈到，政府似乎对市民社会存有戒心。但是，最近出现报道说“市民社会并不恐怖”。

比如，从前政府曾有过在公园里建造大型宾馆的计划，但是因为网上出现了很多反对意见，所以该计划破产了。还有，最近著名律师被逮捕的事件等还没有成为正式的新闻时，在网上已经迅速地流传评论开来。在传统报纸上还没有成为新闻，但是在网上却迅速流传，所以可以说网络的潜在的力量很大。

都筑 我并不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但是我觉得确实在成立组织时不能否定网络便利且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化的世界》这本书中，其主旨是这样的。即因为如果使其成为开放性的资源的话就可以互相审读，所以最后就可以到达客观的真实。然而，我想确实Hannah Arendt进行了那样的区分，若以科学的真理为前提的话或许是这样，但是，社会科学上的言论或者事实上的真实却未必如此。科学上的真理，比如说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这一点是无论受到怎样的镇压也不会变，真理就是真理，可是说到“什么时候谁在哪里说了这一点”的话，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证明绝对是那样的方法。所以，针对借助网络的力量对偶然发生的事情进行无限的否定或

攻击的行为，有着怎样的保护方法呢？我对此十分担忧。我想，要是以前的话，有着一一种报纸和出版物经过调查进行了客观报道的信赖感，但是，今后新闻和出版物渐渐地遭到压制时，究竟由谁来扮演这样的角色呢？

孙

下面最后一个提问是给中西教授的。“在菲律宾贫困层的市民形成中，日本可以做什么？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想也请刘教授回答一下同一个问题。也就是“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培育过程中，日本起着怎样的作用？”。

中西

我只能就这次报告中所谈到的范围以内来回答，我想一个是日本的农业。日本最近有机农业终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我的经验而言，开展有机农业的地方很多都是植根于地区的，所以农业方法自不待言，在农民间的组织形成的方式上，也有很多非常精通的人才。如果创造这些人能够直接与菲律宾从事农业的人进行沟通的环境的话，情况会很不一样起来。

另外一点就是每年去贫民窟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想要刻苦努力学习的高中生。刚才也提到仅仅因为没有交通费这样的理由而放弃进入大学深造的例子，在我调查的那个地区还有很多。虽然这回考上在菲律宾最具权威性的菲律宾大学是第一次，但是，有好几个学生都被认为是肯定能行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奖学金的话，对于菲律宾的贫困层而言，会成为靠自己力量爬上社会阶梯的契机。因为现在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被赋予，所以我想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将是非常好的事情。

刘

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困难，有这样几个想法。第一，日本与中国恢复邦交是在 70 年代以后，一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现代化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着支持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对中国问题发表的言论并不积极。有的时候部分政治家发表否定战争的言论，使两国关系交恶，而十分遗憾的是发表积极而富有建设性言论的场景在 70 年代以后并不多见。我想其中有各种原因，日本人对于过去的战争感到抬不起头。比如说，在韩国与中国的研究者们拼命提议东亚共同体的概念之后，日本的研究者才觉得也可以用。但是，要想克服这一点，在中国问题上也是要先将能够进行建设性发言的环境调整好。

和第一个问题十分相关，很难说日本有着对国际社会很强的信息传播能力。最近，麻生首相说漫画是软力量想以此发信，但是，日本的软力量不仅是漫画和技术，而是政治、社会系统、国民统合的方法论等以各种方式积蓄起来的。应该将其系统性地面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我想这无疑会对亚洲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第二、我认为日本和中国必须创立共通的亚洲学。日本的亚洲学基本上是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学。中国的亚洲学也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以其他亚洲各国为对象。不是如此，而是应该在日本的亚洲学里放入日本，在中国的亚洲学里放入中国。这样一来，共通的亚洲学就建设起来，应该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日本的亚洲学不能充分地谈论亚洲。没有中国的亚洲学也同样不能谈论亚洲，韩国也一样。所以，通过构建包括日本、中国、韩国在内的共通的亚洲学，就可以看到日本的经验、亚洲的经验。我认为这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而言当然是巨大的贡献。

第三，中国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中，有着民族问题和统一的问题。中国人都认识

到这是与现代化建设并列甚至比现代化更为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民族问题和统一的问题的认识，中国人和日本人相距甚远。这一差异有时会引发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后退的结果。

我认为类似反日游行时一部分民众的行动是中国市民社会后退的明显的象征。那是由各种复杂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过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政府正拼命努力解决民族问题和统一问题。与之相对，我认为日本以不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形式发挥领导权、调整好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外部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在今天下午的报告中，出现了一点新加坡的事例。听过之后，新加坡的沈俊杰先生好像笑出了声，请你来谈一谈。

自己绝对不是从市民社会的国家来的人。我来自新加坡。我不明白市民社会的具体定义，是“为了市民的社会”还是“属于市民的社会”呢。想到这两者的差异，东南亚有两个典型的国家。首先，“属于市民的社会”我想起的是菲律宾。People's Power，真的很自由，是一个干什么都可以的国家。但是，尽管我并无恶意，我还是不认为菲律宾是个非常出色的国家。

反过来，我想新加坡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市民很好，有着很想为市民办事的操心的政府。但是，我也决不认为那是个好国家。所以，我来日本了。然而，身边有新加坡人朋友、亲戚、兄弟，我并不认为新加坡人不幸。看不到特别贫困的阶层。自己有些心怀偏见，虽然对于新加坡并无不满，但是大家都觉得好的话，有些遗憾的是我认为难道这样自足了吗？就此想听一听教授们的意见。是“为了市民的社会”，还是“属于市民的社会”，抑或是两者都不错？我对此抱有些许的疑问。

为了调查接受外国劳动者和家务劳动者的实际状况，我去过几次新加坡。所以对你刚才的发言有能够理解的方面。同时，也还是有些抵触的方面。将富裕用于保证自己国民的安定生活是好事，但是，同时富裕的国家也必须承担国际性的义务。遗憾的是新加坡没有批准国际人权宪章。因为要接收外国人让其就劳，我认为就应该重视人权，由此出发在人权方面也希望其作出些国际性贡献。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高教授和宫岛教授。

首先，想问高教授。在韩国现在也存在着兵役制度，健康男子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对此制度，我想听一听您的意见。我也想知道这对市民社会有何影响。

为什么呢？我是来自缅甸的留学生。最近缅甸的军事政府为了建设更强的国家而在进行兵役制度的讨论。我想韩国是因为有朝鲜问题仍需要有兵役制度，但是我个人担心的是在缅甸如果实行这样的制度，会有怎样的影响，又会有怎样的问题。

另一个想问宫岛教授。EU这一想法里当然有很多好的地方。比如说正因为有了没有国境的制度，所以可以自由地出入境，然而这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当然，人们自然会去富裕、生活方便的国家，然而会出现各种问题，于是EU各国共同制定了移民对策的法律。就此我个人认为有很大的问题，想听一听您的见解。

关于兵役，我觉得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不愿意去军队，这一心情是共通的。但

是，在韩国，由于与朝鲜的问题，想要保卫自己的国家的心情很普遍，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B潮流盛行的时期，也出现过“有良心地拒绝兵役运动”，但是其结果并没有大众化。

还有，关于兵役义务，我想是不是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兵役是义务，所以很难避免，但是，比如说假定某人结束了兵役，作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人获得了作为国民的某个特别权利。拿韩国的例子来说，在1987年一般的人提出民主化要求时，结束了兵役的人穿上在军队时所穿的军服参加了民主化游行。他们大体上是结束兵役准备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在这个意义上，是与所谓的“运动圈”不同的“非运动圈”的一般大学生更为接近的人群。通过这些人的参加，民主化运动力量大增。我想，“不能无视完成国防义务的他们的存在”这一政府方面的顾虑也是存在的。这样，暂且不论好坏，若在某种条件下需要国家的民主化时，完成兵役的人们可能获得很大的发言权。

但是，像韩国这样军部政权执政时间长、其军队文化成为文化主轴的话，很容易倾向于全体主义的想法，也确实存在树立垂直型的命令体系并服从于此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很难片面地作评价。

宫岛

刚才您的提问是个很大的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讲清楚。战后欧洲各国之所以接收外国劳动者，那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而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为了战后复兴，为了高速经济增长而有必要。只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后的情况。

在爆发了石油危机、决定减少外国人劳动者或者不再接收的时候，欧洲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断。承认他们的定居、允许叫上亲人。这两点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而是有着人权和人道上的理由。我目睹了当时欧洲的NGO和一般市民的运动，认为这非常出色。结果，在NGO的十分强烈的推动下，承认定居、允许叫上亲人。其后，在欧洲，定居的外国劳动者不久成为移民，更进一步地也成为市民。

在现阶段，积极地接收外国人的国家很少。但是，由于不拒绝难民，所以，在英国、德国、法国每年数万人的难民涌入。虽然欧洲各国接收外国劳动者起步于现实的必要性，但是在发生问题时，不能说是不用了就赶出去，也不应该这样。我觉得这是欧洲人权思想的成熟之处。

孙

今天这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让80年代出生的刘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未知的世界。

刘健

在刘教授的报告中也指出，80年以后、9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的想法与以前的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想法，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像我这样80年代前半出生的人总是位于两难的处境之中，很痛苦。那是因为我最初是在臣民思想、臣民意识中成长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下子进入了信息爆炸的社会，所以像我这样的，既有着传统的中国人的想法，也有着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当然，我现在也有着强烈的个人主张，但是觉得不知不觉中在心灵的角落里有个不一样的声音。所以，我希望刘教授将像我这样特别的存在也考虑进您的研究中。我就简单地谈一下感想。

权南希

在日本,据说外国人登录制度将要改变。迄今为止由区、自治体来管理的外国人登录证将会消失,而由国家来综合地进行管理。关于出入境的纪录和那个人住在什么地方等个人信息,将变为靠一张卡就能够马上确认的系统。只能认为日本在关于移民和难民问题上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国家。我的问题是,从东亚共同体的观点来考虑时,该如何来理解这种倾向呢。

刚才提到了韩国的外国人地方参政权制度,我觉得韩国引进这一制度与其说是教授所指出的市民社会成熟的结果,不如说一部分是出于中央政府或地方的自治体的需要,所以制度应运而生。韩国去年登记的外国人口超过了全人口的10%。并不是外国劳动者进入韩国国内而成为10%,实际上由于国际结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单身男子那里有很多中国朝鲜族的人,最近越南人很多。通过这样的国际结婚,人口急剧增加,包括那些人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在内,韩国国内产生了十分复杂的状况。为此,不是首尔、釜山这些都市,而是有着农村地区的地方自治体在各个方面都很辛苦,国家到了一种不得不引进这样的制度的状况。

日本整体上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数据,但是据说居住在横滨的14%左右是外国人,新宿为20%。包括这些状况在内,对于2009年将要改变外国人登录制度的动向,想听一听教授您的见解。

宫岛

刚才有人就在韩外国人参政权和外国人基本法整備的背景进行提问。实际上,我去年夏天去韩国,就我的调查而言,我判断韩国政府并没有将大城市附近的很多外国人劳动者视为制定基本法的对象,而主要对象是在农村的很多嫁过去的女子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在韩国定居的朝鲜族。

在日本,外国人登录制度改变了。此前是在地方自治体的公务所进行登记,由公务所向法务省汇报的形式,今后将由法务省一元化管理。将法务省的数据送给各地方自治体,地方自治体据此制成关于外国人的住民台帐。这在提高行政效率上也许是好,但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即接收外国人果真光这样就行了吗。

因为不正规逗留的人们总是存在,将这些人一概地视为犯罪者行吗?我们十分苦恼。今年,菲律宾Calderon一家被亲子分离地遣返,但是,在日本住了10年的亲子的纽带是可以以此割断的吗?如果是欧洲的人权裁判所的话,应该会作出允许父母亲留下的判决。我觉得对于不法逗留的人们,应该采取稍微人道一点的看法,这样的情况不是有很多吗?

另一个差异是,一变成新的外国人登录系统,地方自治体的权限就几乎为零。根据地方自治体的判断,超过逗留期限的人也能进行外国人登录,这是以往很多自治体的态度。所以,没有在住资格的不正规逗留者,由于是住民,所以暂且发给外国人登录证,拿着它的话可以在各个地方办理手续,但是今后将不再可能。估计以正规形式逗留的人完全感觉不到问题,但是被置于不安定境地的人们将会在没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自己的状态中生活着。政府大概想一举扫清不正规逗留者,但是不仅是我,对于很多研究移民、外国人的研究者来说,果真这是人道的想法吗?我对此抱有疑问。

2年后新制度就要实施,在此之前,我自身也必须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

权南希

不法逗留者的孩子应该也不能升入小学等吧?

宫岛 今后要上学会变难吧。只要进行了外国人登录的话，各地的教育委员是不会检查在留资格而让其办理入学手续，但是，什么都没有的话，我担心会有教育委员会拒收。希望他们再重新考虑一下“孩子的权利”。

孙 会议已经严重超时，最后请各位教授每人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高 利用准备发言的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有关移民和韩国社会的现在的知识。会议开始时主持人介绍我是地球市民研究组的负责人，我今后更有必要度过与之相配的时间。我再次感到今后对于韩国内部的市民社会以及东亚的市民社会也要多加学习。

Chi 这次学到了很多东西，将对我今后的研究生活大有裨益。

林 东亚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后越来越有必要进行讨论，而且也存在着这样的余地。所以，我想在不远的将来就东亚市民社会形成的特征以及发展阶段的各个有趣的侧面进行类似或者更进一步的讨论。



宫岛 我在提纲上也提到，我认为包括日本在内，在亚洲如何很好地对待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特别对于日本来说更是如此。我完全没有只针对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意图。

都筑 对不起请教一下林先生，香港和台湾的自我认同，如果在其前面加上什么词语的话，称作什么自我认同呢？

林 一种市民自我认同吧。

都筑 多谢。

中西 在亚洲，或许菲律宾非常特殊。这次论坛是重新审视市民这一概念的很好的机会。我觉得如果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发展成能够直接对话的关系就好了。

刘 亚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寻找共同项很难。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将“市民”作为共同项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今后我要努力理解“80后”，至少是“前80后”（8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人）们的心情。

报告人简历

■ 宫岛 乔 MIYAJIMA Takashi

【现职】法政大学大学院教授

【简历】

1940年出生于东京都。东京大学毕业，法国Université de Tours 留学。历任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立教大学教授。

【著作】

『ヨーロッパ社会の試練』、『文化と不平等』、『外国人と政治参加』、『ヨーロッパ市民の誕生』、『フランス移民社会の危機』等。

■ 都筑 勉 TSUZUKI Tsutomu

【现职】信州大学経済学部教授

【简历】

1978年 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
1985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退学（学分修满），信州大学教养学部专任讲师
1988年 同助教
1995年 同経済学部助教
1997年 同教授

【著作】

1. 『戦後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眞男とその時代』（世織書房、1995年）
2. 『政治家の日本語』（平凡社新書、2004年）
3. 『政治家の日本語力』『政治家の日本語』増補版（講談社＋α文庫、2009年）
4. 「丸山眞男における政治と市民」高島通敏編『現代市民政治論』（世織書房、2003年）
5. 「政治社会の内部と外部——丸山眞男の位置をめぐって」『思想』2006年8月号
6. 「隠れたる市民社会——引き延ばされた社会契約の結び直し——」『社会科学研究』第58巻第1号（2006年9月）

■ 高 熙卓 KO Heetak

【现职】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

【简历】

1990年 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毕业
1997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硕士学位取得
2004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学位取得
2008年 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

【著作】

1. 「伊藤仁斎の「王道」論」（『倫理学年報』第47集、1998年）
2. 「徳川17—18世紀における秩序論の様相——仁斎学と徂徠学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思想史』第31号、1999年）
3. 「昌益における「自然」と「聖人」、そして公共性探求」（『思想史研究』No. 4、2004年）
4. 「近世日本思想における公共探求」（東京大学大学院博士学位論文、2004年）
5. 「高橋亨の朝鮮思想史論における両義性——過去の「他者化」のために」（韩语『今日の東洋思想』No. 13、2005年）
6. 「「神国日本」の政治思想」（韩语『日本研究論叢』No. 28、2008年）
7. Imagination for 'Others', Japan Spotlight (Bimonthly), published by Japan Economic Foundation, September/October 2007.

■ 中西 彻 NAKANISHI Toru

【现职】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地域研究、开发经济）

【简历】

1989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修了（経済学博士），国际大学助手
1991年 北海道大学助教授
1993年 东京大学助教授
2001年 东京大学教授（至今）

【著書】

1. 『スラムの経済学』（単著、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開発と貧困』（共著、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8年）

2. 『アジアの大都市：マニラ』（共編著、日本評論社、2001年）、Metro Manila: In Search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Impact Analysis of Metropolitan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共著、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2002）
3. 「メトロマニラへのコンポスト型トイレによる有機物オンサイト処理の導入の可能性について」『環境システム』第30巻（共著、2002年）
4. 「地域社会と人間の安全保障：マニラ貧困層におけるコミュニティの出現」『ワールドトレンド』124号（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6年）、『新・世界地理：東南アジア』（共著：朝倉書店、近刊）
5. 『人間の安全保障』（共著：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
6. “Hidde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 Community among the Urban Poor,” Policy and Society, vol. 25, no. 4, pp. 37-61, 2006

■ 林 泉忠 LIM John Chuan-tiong

【现职】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琉球大学准教授

【简历】

- 2002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法学博士）、琉球大学法文学部专任讲师
- 2004年 同助教授
- 2007年 同准教授

【著作】

1. 『「辺境東アジア」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ポリティクス：沖縄・台湾・香港』（単著、明石書店、2005年）
2. 『現代アジア研究 第2巻：市民社会』（共著、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
3. 『やわらかい南の学と思想：琉球大学の知への誘い』（共著、沖縄タイムス出版社、2008年）
4. 『グローバル・ディアスポラ 第1巻：東アジア』（共著、明石書店、2009年）
5. 《时代变局与海外华人的族国认同》（共著、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2005年）
6. 《新世纪移民的变迁》（共著、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6年）
7. 《新世纪、新视野下之海外华人研究》（共著、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9年）

■ Vu Thi Minh Chi

【现职】越南社会科学研究院人间研究所所属研究员

【简历】

- 1983年 越南教育科学研究所所属
- 1999年 一桥大学博士学位取得
- 2002年 现职

【著作】

1. 「ドイモイベトナムにおける価値観の変容」（共同研究、2006年）
2. 「ベトナムにおける人間開発の目標としての人権実現の中枢課題」（2009年）

■ 刘 杰 LIU Jie

【现职】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

【简历】

- 1962年 出生于北京
- 1982年 来日本，东京大学入学
- 1986年 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
- 1988年 筑波大学大学院历史人类学研究科修士课程修了，文学修士
- 1993年 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博士（文学）学位取得
- 历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圣心女子大学兼任讲师等，1996年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98年 同助教授、2003年 同教授
- 专业为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东亚国际关系史。

【著作】

1. 『日中戦争下の外交』（吉川弘文館、1995年）
2. 『中国人の歴史観』（文芸春秋、1999年）
3. 『漢奸裁判』（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
4. 『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共編、東大出版会、2006年）
5. 『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共著、岩波書店、2007年）
6. 『1945年の歴史認識』（共編、東大出版会、2009年）

后记

第36回 SGRA 论坛 in 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
21 世纪的课题
——报告

林少阳 / Kaba Melek

2009年7月25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晚上9点30分，在轻井泽以“东亚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为主题举办了第36回 SGRA 论坛。

SGRA 以“良好地球市民的实现”作为基本目标，自2000年7月设立以来，一直对全球化与市民社会加以关注，持续进行相关研究活动。这次研讨会是其中一个环节，由“全球化与地球市民”研究小组负责。本次论坛作为一个交换意见的平台，就东亚地区特别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香港、越南、中国，针对“何为市民社会”这一疑问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这是在与欧洲式市民社会的背景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东亚各国的“市民”是什么、NGO 以及 NPO 等市民社会运动团体的现状如何的一次尝试。

论坛上，在今西淳子代表的开会致词之后，7位老师以及 SGRA 研究员进行了研究报告。在各个报告后，除了有问答之外，晚上还开设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公开座谈讨论会，台下的听众踊跃提问，并进行了点评。

首先，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讲演，宫岛乔先生（法政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教授）以“寻求市民社会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足迹与亚洲”为题进行了报告。宫岛教授阐述了以打造无国境欧洲为目标的 EU 与欧洲市民社会的传统与现实的关联，指出了 EU 的问题点，并进行了展望。他认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各国目标建立独立国家，在其过程中民族主义高涨，而战后欧洲国家民族主义是从认识到自身的恶而起步的。之所以将“市民社会”这一关键词的来源——欧洲设定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讲演是因为意识到东亚的现实和可能性。但是，与超越国家单位作为一个共同体变化的欧洲不同，在东亚除了 ASEAN 以外还未实现“超越国境的地区统合”，这成为今后的课题。他特别强调了欧洲各国在接受难民和移民方面的义务感和人权意识。

第二位是都筑勉先生（信州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他从近代日本的市民社会政治的研究者的立场出发作了“从‘市民社会’到‘市民政治’”的报告。都筑先生通过“市民社会”这一关键词介绍了近代日本，特别是战后社会的变迁、60年代安保中市民社会诞生的经过、影响和发展等。而且强调了对党派的宗派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超越的“结社型的新型市民政治”的可能性。都筑先生的发表让我们感受到在日本国内与市民的主体性相关联的市民与政府有着重新缔结契约的可能性，在国外有着日本与亚洲、特别是东亚连带的可能性值得期待。

第三位是高熙卓先生（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科研究教授、SGRA“地球市民研究小组”负责人），他的报告是“韩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从‘民众’到‘市民’——殖民地、隔阂与战争、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民主化”。高先生介绍了从19世纪末殖民地时期到解放、南北分割后，60-70年代的开发独裁与近代化时期的民主化运动中“民众”、“人民”这些词语的意思的变化和表达方式的变迁，阐明了市民政治在现代韩国所具有的意义与问题点。“市民”得到肯定、“非营利民间团体支援法”的诞生是在2000年，那就是韩国的市民社会的萌芽。高先生的发表中所指出的有着自下而上的民主主义历史的韩国现代史的独特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先生是为这次研讨会的企划和实施尽心尽力的关键人物。

第四位报告人是中西彻先生（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他的主题是“菲律宾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菲律宾的‘市民社会’与‘不良撒马利亚人’”。中西先生拿先登上塔的人“踢开梯子”的行为打比方，介绍了通过开发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而强化了发达国家的压制性的构造。也就是说，他指出，在与“国际社会上的Bad Samaritan（IMF、世界银行、WTO等国际机关、以及支持它们的发达国家）”的关系中，菲律宾不能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中摆脱出来。但是，他又介绍了菲律宾农村的人们利用已有的地区社会资源使其固定性的阶层社会相对化、流动化的情况，在贫困阶层为了获得权利和自立形成网络的意义，展示了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第五位报告人是林泉忠先生（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琉球大学准教授、SGRA研究员），其主题是“台湾、香港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被‘国家’所愚弄的‘边境东亚’的‘市民’——脱殖民地化、脱‘边境’化的纠葛与自我认同的探索”。林先生以台湾、香港为例，在总结了这两个地区市民社会形成的特征的基础上阐述了其与“国家”的关系、与殖民地的历史的关系，并且明确了在这两个不同地区的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与民主化及自我认同形成的关系。

第六位报告人是Vu Thi Minh Chi女士（越南社会科学院人间科学研究所研究员、SGRA研究员），其报告的主题是“越南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变化的越南、变化的‘市民社会’的姿态”。Chi女士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具体的数据显示了这15年间在越南“市民社会”这一“敏感”的用语、概念本身的变迁，指出出现了NGO与CBO组织等增加的倾向。她同时还就越南的市民社会的形成经过、现状及

其可能性与中国、新加坡等国进行了比较。

最后的报告人是刘杰先生（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教授），其主题是“中国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摸索中的‘中国式市民社会’”。刘教授强调了在中国现代“1949年”与“1978年”（特别是后者）的意义，认为奥运会以及四川省大地震后的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活动兴盛的“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而且，刘教授以“公民社会”这一关键词强调了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独自的语境，同时以“知识界”这一用语选取知识人对有所抬头的民族主义进行批评，介绍了中国的知识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形成中的作用。刘教授提示了网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年轻一代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公民社会”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晚饭后，从7点半到9点，举行了由孙军悦女士（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非常勤讲师、SGRA研究员）主持，上述报告人参加的以“东亚的市民社会与21世纪的课题”为主题的公开座谈讨论会。讨论会上，有很多提问，参加者们进行了回答与讨论。会上认为如果东亚今后要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话，还需要时日，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作为课题留下来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问题。这次论坛本身是以“东亚”为单位来进行思考的一个尝试，我们认为这是最大的成果。今后东亚的状况将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上升而左右。而且，东亚地区跨越战争的负面记忆、建立起新的连带、合作体制是今后的课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比较有余力的日本应该自发地发挥呼吁合作、统合的作用。

当天的照片，请参阅下面的URL。

<http://www.aisf.or.jp/sgra/photos/>

林少阳

（简历）厦门大学本科、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硕士毕业。学术博士（东京大学）。1999年来日本。经过东京大学博士课程、东京大学助手后，现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准教授。著作有《“文”与日本的现代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7月）、『「修辞」という思想：章炳麟と漢字圏の言語論的批評理論』（白泽社、即将出版）以及其他许多关于日本和中国的文学、思想史的论文。SGRA研究员。

Kaba Melek

（简历）土耳其人。2003年来日本。目前就读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文艺言语专攻博士课程。专业领域是比较文学、文化。SGRA研究员。

SGRA 報告書 已出版旧刊介绍

- SGRA レポート 01 設立記念講演録 「21 世紀の日本とアジア」 船橋洋一 2001.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2 CISV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への挑戦：多様性の中に調和を求めて」
今西淳子、高 偉俊、F.マキト、金 雄熙、李 來賛 2001. 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技術の創造」 畑村洋太郎 2001.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4 第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の皆さんへ」 関 啓子、L.ビッヒラー、高 熙卓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5 第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なかの新しい東アジア：経済協力をどう考えるべきか」
平川 均、F.マキト、李 鋼哲 200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6 投稿 「今日の留学」「はじめの一歩」 工藤正司 今西淳子 2001. 8.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7 第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共生時代のエネルギーを考える：ライフスタイルからの工夫」
木村建一、D.バート、高 偉俊 2001. 10.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8 第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 教育革命：IT は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
白井建彦、西野篤夫、V.コストプ、F.マキト、J.スリスマンティオ、蔣 恵玲、楊 接期、李 來賛、
斎藤信男 2002. 1.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09 第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と民族主義：対話と共生をキーワードに」
ペマ・ギャルポ、林 泉忠 2002. 2. 2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0 第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とイスラーム：文明間の対話のために」
S.ギュレチ、板垣雄三 2002. 6.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1 投稿 「中国はなぜW T O に加盟したのか」 金香海 2002. 7.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2 第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環境診断：地球の砂漠化を考える」
建石隆太郎、B.ブレンサイン 2002.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3 投稿 「経済特区：フィリピンの視点から」 F.マキト 2002. 12. 12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4 第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新しい東アジア」
+ 宮澤喜一元総理大臣をお迎えしてフリーディスカッション
平川 均、李 鎮奎、ガト・アルヤ・プートゥラ、孟 健軍、B.ヴィリエガス
日本語版2003. 1. 31 発行、韓国語版2003. 3. 31 発行、中国語版2003. 5. 30 発行、英語版2003. 3.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5 投稿 「中国における行政訴訟—請求と処理状況に対する考察—」 呉東鎬 2003. 1.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6 第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情報化と教育」 苑 復傑、遊間和子 2003.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7 第1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21 世紀の世界安全保障と東アジア」
白石 隆、南 基正、李 恩民、村田晃嗣 日本語版2003. 3. 30 発行、英語版2003. 6. 6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8 第1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地球市民研究：国境を越える取り組み」
高橋 甫、貫戸朋子 2003.8.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19 投稿 「海軍の誕生と近代日本—幕末期海軍建設の再検討と『海軍革命』の仮説」
朴 榮濬 2003.12.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0 第1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環境問題と国際協力：C O P 3の目標は実現可能か」
外岡豊、李海峰、鄭成春、高偉俊 2004. 3.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1 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 「アジア共同体構築に向けての日本及び韓国の役割について」 2004.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2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民族紛争－どうして起こるのか どう解決するか」 明石康 2004.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3 第1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
宮島喬、イコ・プラムティオノ 2004.2.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4 投稿 「1945年の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の中国に対する援助：その評価の歴史」 フスレ 2004. 10.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5 第1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国境を越える E-Learning」
斎藤信男、福田収一、渡辺吉鎔、F.マキト、金 雄熙 2005. 3.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6 第1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この夏、東京の電気は大丈夫？」 中上英俊、高 偉俊 2005.1.24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7 第1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過去・現在・未来」
竹田いさみ、R.エルドリッヂ、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8 第1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地球市民の義務教育-」
宮島 喬、ヤマグチ・アナ・エリーザ、朴 校熙、小林宏美 2005. 7.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29 第18回フォーラム・第4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韓流・日流：東アジア地域協力におけるソフトパワー」 李 鎮奎、林 夏生、金 智龍、道上尚史、木宮正史、李 元徳、金 雄熙 2005. 5.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0 第1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文化再考－自由と市民社会をキーワードに－」
宮崎法子、東島 誠 2005. 1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1 第2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雁はまだ飛んでいるか」
平川 均、渡辺利夫、トラン・ヴァン・トウ、範 建亭、白 寅秀、エンクバヤル・シャグダル、F.マキト
2006. 2.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2 第2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は外国人をど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か－留学生－」
横田雅弘、白石勝己、鄭仁豪、カンピラパーブ・スネート、王雪萍、黒田一雄、大塚晶、徐向東、角田英一
2006. 4.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3 第2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戦後和解プロセスの研究」 小菅信子、李 恩民 2006. 7.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4 第2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本人と宗教：宗教って何なの？」
島蘭 進、ノルマン・ヘイヴンズ、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ヤ、ミラ・ゾンターク、セリム・ユジェル・ギュレチ
2006. 1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5 第2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ごみ処理と国境を越える資源循環～私が分別したごみはどこへ行くの？～」
鈴木進一、間宮 尚、李 海峰、中西 徹、外岡 豊 2007. 3.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6 第2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Tは教育を強化できるか」
高橋富士信、藤谷哲、楊接期、江蘇蘇 2007. 4.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7 第1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 「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若者の未来と日本語』」
池崎美代子、武田春仁、張 潤北、徐 向東、孫 建軍、朴 貞姫 2007. 6.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8 第6回日韓フォーラム in 葉山講演録 「親日・反日・克日：多様化する韓国の対日観」
金 範洙、趙 寛子、玄 大松、小針 進、南 基正 2007. 8. 3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39 第2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私たちの出会いと将来～」
黒住 真、韓 東育、趙 寛子、林 少陽、孫 軍悦 2007. 1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0 第2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アジアにおける外来種問題～ひとの生活との関わりを考える～」
多紀保彦、加納光樹、プラチャヤー・ムシカシントーン、今西淳子 2008. 5.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1 第2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いのちの尊厳と宗教の役割」
島蘭進、秋葉悦子、井上ウイマラ、大谷いづみ、ランジャナ・ムコパディヤーヤ 2008. 3.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2 第2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新疆講演録 「黄土高原緑化協力の15年—無理解と失敗から相互理解と信頼へ—」 高見邦雄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2008. 1.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3 渥美奨学生の集い講演録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主義」 平川均 2008. 3. 1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4 第2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広告と社会の複雑な関係」
関沢 英彦、徐 向東、オリガ・ホメンコ 2008. 6.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5 第3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教育における『負け組』をどう考えるか～日本、中国、シンガポール～」
佐藤香、山口真美、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 2008. 9. 2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6 第31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水田から油田へ：日本のエネルギー供給、食糧安全と地域の活性化」
東城清秀、田村啓二、外岡 豊 2009. 1.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7 第32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オリンピックと東アジアの平和繁栄」
清水 諭、池田慎太郎、朴 榮濬、劉傑、南 基正 2008. 8. 8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8 第3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延辺&北京講演録 「一燈やがて万燈となる如く—アジアの留学生と生活を共にした協会の50年」 工藤正司 日本語版、中国語版2009. 4.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49 第3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経済統合が格差を縮めるか」
東 茂樹、平川 均、ド・マン・ホーン、フェルディナンド・C・マキト 2009. 6.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0 第8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日韓の東アジア地域構想と中国観」
平川 均、孫 洌、川島 真、金 湘培、李 鋼哲 日本語版、韓国語 Web 版 2009. 9.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1 第35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テレビゲームが子どもの成長に与える影響を考える」
大多和直樹、佐々木 敏、渋谷明子、ユ・ティ・ルイン、江 蘇蘇 2009. 11.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2 第36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東アジアの市民社会と21世紀の課題」
宮島 喬、都築 勉、高 熙卓、中西 徹、林 泉忠、ブ・ティ・ミン・チィ、劉 傑、孫 軍悦 2010. 3. 2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3 第4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上海講演録 「世界的課題に向けていま若者ができること～TABLE FOR TWO～」 近藤正晃ジェームス 2010. 4.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4 第37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エリート教育は国に『希望』をもたらすか：東アジアのエリート高校教育の現状と課題」 玄田有史 シム チュン キャット 金 範洙 張 健 2010.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5 第38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都市・建築のエネルギー事情とライフスタイル～」 木村建一、高 偉俊、Mochamad Donny Koerniawan、Max Maquito、Pham Van Quan、葉 文昌、Supreedee Rittironk、郭 榮珠、王 剣宏、福田展淳 2010. 12. 15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6 第5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 「中国の環境問題と日中民間協力」
第一部（北京）：「北京の水問題を中心に」 高見邦雄、汪 敏、張 昌玉
第二部（フフホト）：「地下資源開発を中心に」 高見邦雄、オンドロナ、ブレンサイン 2011. 5. 1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7 第39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ポスト社会主義時代における宗教の復興」
井上まどか、ティムール・ダダバエフ、ゾンターク・ミラ、エリック・シッケタンツ、
島蘭進、陳 継東 2011. 12. 30 発行
- SGRA レポート 58 投稿 「鹿島守之助とパン・アジア論への一試論」 平川 均 2011. 2. 15 発行

- SGRAレポート59 第10回日韓アジア未来フォーラム講演録「1300年前の東アジア地域交流」朴 亨國、金 尚泰、胡 潔、李 成制、陸 載和、清水重敦、林 慶澤 2012. 1. 10 発行
- SGRAレポート60 第40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の少子高齢化問題と福祉」田多英範、李 蓮花、羅 仁淑、平川 均、シム チャン キャット、F・マキト 2011. 11. 30 発行
- SGRAレポート61 第41回SGRA フォーラム講演録「東アジア共同体の現状と展望」恒川恵市、黒柳米司、朴 榮濬、劉 傑、林 泉忠、ブレンサイン、李 成日、南 基正、平川 均 2012. 6. 18 発行
- SGRAレポート62 第6回チャイナ・フォーラム in 北京&フフホト講演録「Sound Economy ～私がミナマタから学んだこと～」柳田耕一「内モンゴル草原の生態系：鉱山採掘がもたらしている生態系破壊と環境汚染問題」郭 偉 2012. 6. 15 発行
- SGRAレポート64 第43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n 蓼科「東アジア軍事同盟の課題と展望」朴 榮濬、渡辺 剛、伊藤裕子、南 基正、林 泉忠、竹田いさみ 2012. 11. 20 発行
- SGRAレポート65 第44回フォーラム講演録 in 蓼科「21世紀型学力を育むフューチャースクールの戦略と課題」赤堀侃司、影戸誠、曹圭福、シム・チュン・キャット、石澤紀雄 2013. 2. 1 発行

■ 想要报告书着,请与SGRA事務局联系!(Tel: 03-3943-7612 Email: sgra.office@aisf.or.jp)

SGRA 报告 No.52 (中文版)

第 36 回 SGRA 论坛 in 轻井泽
东亚的市民社会与 21 世纪的课题

编辑 / 发行

(公益财团法人)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 (SGRA)

112-0014 东京都文京区关口 3-5-8

Tel : 03-3943-7612 Fax : 03-3943-1512

SGRA 主页 : <http://www.aisf.or.jp/sgra>

电子邮件 : sgra-office@aisf.or.jp

发行日 2013 年 12 月 20 日

发行责任者 今西淳子

印刷 Web 出版